

中国无产阶级第三次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试用讲义)

下册

「武汉大学哲学系」编 一九七三年三月
「毛泽东主义群众革命社」版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四日

目录

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1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	1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1
二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2
划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	2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	2
当前两种历史观斗争的焦点.....	4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	5
唯心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5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	6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在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	6
第七讲 社会基本矛盾	8
一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8
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	8
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	9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10
生产力的特点.....	10
生产关系的特点.....	10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11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	12
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13
历史上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14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15
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17
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	17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18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	18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19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21
第八讲 阶级、国家、革命	23
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23
阶级的产生及其实质.....	23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25
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26
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	28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29
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30
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30
国家的职能.....	31
国体与政体.....	31

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32
三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33
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33
民主主义革命.....	34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36
<hr/>	
第九讲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39
<hr/>	
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39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39
社会主义历史阶级斗争的规律.....	40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41
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42
二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3
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44
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45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46
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46
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46
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4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	48
四 阶级的消亡和国家的灭亡.....	50
阶级的消亡.....	50
国家的消亡.....	51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51
<hr/>	
第十讲 社会意识形态.....	52
<hr/>	
一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52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52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53
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55
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关系.....	56
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相互作用.....	56
二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56
社会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56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57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59
三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	60
政治思想.....	60
法权思想.....	61
道德.....	61
科学.....	63
哲学.....	64
文艺.....	64
宗教.....	65
<hr/>	
第十一讲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67
<hr/>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67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67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68
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68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69
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不同的.....	70
二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70
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	70
彻底批判唯心史观在个人作用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72
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和党的群众路线.....	75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75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群众路线.....	76

第六讲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前面各讲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曲折地向前发展的永无止境的客观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而且也存在于人类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要树立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仅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毛主席指出，许多人之所以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深入批修整风的今天，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唯心史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所持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历观，又叫唯物史观。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具体的社会科学。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例如，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法学研究国家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各种历史科学所研究的是某一特定民族社会的历史规律，它通过搜集历史事实，描绘具体的历史进程，体现出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总体上，从社会生活的全貌来研究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世界史虽也研究一切民族、一切社会的历史，但世界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关于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具体看法，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则是关于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适用于社会科学各部门，为这些部门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把它们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列宁指出：唯物史观就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列宁：《卡尔马克思》）。斯大林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和发挥。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而事物发展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同样，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发展的源泉也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全部历史所作的科学概括。

反之，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对于形成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是半截的唯物主义，只有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才是唯物主义的，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有三大局限性即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唯心主义。（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要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向前发展唯物主义，不仅需要克服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而且尤其需要在社会历史领域克服唯心主义，建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否则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打倒一切唯心主义，才能建立完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其次，从理论内容上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历史唯物主义存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然而这个基本观点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开的。如果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实践的内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毛主席：《实践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原理才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指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

关系，这样才可能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又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的原理，是科学地了解人类意识的本质和起源的关键。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推广和运用，而这种推广和运用的本身，同时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彻底发挥它极大地加深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界、人类思维的考察，从来是和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正因为这样，它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最完备、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列宁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时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任何企图分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观点和作法，都是有害的，都会离开马克思主义。

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波格丹诺夫，都企图破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声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历史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波格丹诺夫则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这种反动谬论和做法曾经遭到列宁的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企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出去，以此来达到他们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在社会主义中国也有人鼓吹所谓“分化论”，他们胡说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这种观点的实质，不过是重复修正主义者分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滥调而已，其目的是要阉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贩卖唯心史观，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对于这种错误观点必须彻底批判。

二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划分两种历史观的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这两种历史观是由于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而产生的。如前所述，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同样，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就是由此产生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什么？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还是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也就是说，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还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某种精神的力量。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不过是某种神秘的、在世界之前就存在的“绝对观念”产生出来的，并且是由“绝对观念”本身的运动而引起发展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精神力量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思想、意志。以上说法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精神、思想、观念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否认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和极终原因。从这种唯心的观念出发，历史唯心主义者对于阶级社会中阶级对立的客观事实，或者根本抹煞，或者用人的心理、才能以及政治暴力等原由来解释，否认阶级划分的经济根源，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历史唯心主义者既然把思想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必然要夸大所谓具有非凡思想和才能的“英雄”的作用，而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广大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心主义者从思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出发，必然要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否认社会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曾经深刻指出，历史唯心主义有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列宁：《卡尔·马克思》）。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点原因不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而是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根源，这就是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思想、观念、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是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的。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期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要中去寻找**”。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社会存在中，从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所谓社会存在主要是指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条件也是社会存在的内容，它们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社会意识就是指社会的精神生活，即政治法权思想、道德、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为什么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社会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你们过日子、经营事业、生儿育女、生产物品、交换产品等等，这些事实形成事件的客观必然的链条、发展的链条，这个链条不依赖于你们的社会意识，永远也不会为社会意识所完全把握。**”这就是说，人类社会进行活动的虽然是有意识的人，但它同自然界一样有着本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不能自由的按照主观愿望来选择社会生产力。每一代新人，都只能从他们的先辈那里获得现成的生产力，以此作为继续生产的出发点。同样，人们也不能离开既定的历史条件而自由地选择生产关系，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处于既定的、当时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中，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接受这种现成的状况并以它作为生活的起点。当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不是不可改变、不能发展的，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实践的水平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生产力的性质。

社会存在不依赖于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却依赖于社会存在因为任何社会意识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人们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没有被反映者，就不可能有反映者，没有社会存在就不可能有社会意识列宁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任何社会意识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是随着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去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伯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还表现在社会意识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在阶级社会中则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地主阶级宣扬孔孟之道、“忠孝仁爱”为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资产阶级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是为了欺骗群众，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少奇一类骗子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天才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巨大的动能作用。恩格斯指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而且是第二性的作用**”。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有两种情形。斯大林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这就是说，代表腐朽势力的旧思想和理论，如果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就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和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又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这就是说，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展。

社会意识的重大作用是必须估计到的，但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后的决定的原因。因为，当着它成为某一历史事变的原因之前，它的产生是另一更深刻的原因的结果。这一更深刻的、更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关系），而它本身只是这个社会存在的反映。例如，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指导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决定的意义，但是引起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是由于它适合于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由于它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毛主席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之流胡诌什么“西方新观念”输入中国，引起了革命的谬论时指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了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既反对了抽掉社会意识的物质根源，把社会意识看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历史唯心论，同时又避免了否认社会意识能动作用的机械唯物论。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观点出发，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前所述，社会存在首先的和主要的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决定

一个社会的性质、面貌，决定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又是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分不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观点出发，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贯穿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表现为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必然引起阶级斗争，而且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不断的得到揭露和解决。因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国家则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阶级社会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的基础，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承担者，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受它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而这些客观规律是通过社会的人们（在阶级社会则通过阶级、政党、社会集团等等）的自觉活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体现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在于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的根本不同的回答。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根本观点出发，必然否认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根本原则出发，必然坚持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可见，只有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人类社会生活给予科学的说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首先掌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才能划清两种历史观的界限，才能识破历史唯心主义的种种伪装。

当前两种历史观斗争的焦点

如前所述，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中的两军对战，是各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尖锐地反映着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它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历史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是他们推行反革命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总是竭力宣扬反动的唯心史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为了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竭力鼓吹反动的唯心史观，他们用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英雄史观等黑货全面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称天才和讲政变两个问题上。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当前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斗争的焦点之一；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任何个人都不能决定历史、主宰历史。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竭力鼓吹反动的“天才论”、鼓吹“英雄史观”，以此作为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天生愚蠢的“糊涂虫”、“马大哈”；另一类是少数所谓“天赋”、“天资”、“天分”很高的“天才”、“英雄”，历史是由这些人创造的，他们的意志、权力可以决定一切。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这种反动谬论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天才”、“超天才”，自封为创造历史的“英雄”，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历史是政变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当前两种历史观斗争的又一焦点。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整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又一基本观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从地主资产阶级的故纸堆中搜集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搞了一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们专讲个人，不讲群众，专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把政变看成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而是少数阴谋家、冒险家接二连三策动政变的历史。这样，历史上一切策动反动政变的小丑，在他们眼下都成了旋转乾坤的“英雄”，人民群众则成了任凭摆布的工具。他们还把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个人之间、派别之间的斗争。这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唯心史观的又一大暴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无论在中国，在世界，一代代王朝的覆亡，一顶顶王冠的落地，

社会从一种制度改变为另一种制度，其根源都在于深刻的社会矛盾，而每一反动统治制度又都是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复斗争的冲击下崩溃的。历史上一再重演的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归根到底也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斗争尖锐化的直接或曲折的反映。任何政变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都不能决定历史的“本质”。在阶级社会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而决不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诬蔑的个人之间、派别之间的斗争。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称“天才”，讲政变，表面上看好像是两回事，其实只不过是反动的唯心史观的两种表现形式。他们顽固地坚持“天才论”，坚持“英雄史观”，这就必然使他们狂热地迷信个人的意志和权力，迷信少数人的阴谋活动可以改变历史。他们认为，只要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大权，从“上头一阵风吹下去，就能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天下顷刻大变，历史全部改观。这种历史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否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寻找，而应当在社会存在中，在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寻找这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鼓吹个人的意志、权力和阴谋活动可以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这种唯心史观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漫高权力，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他们鼓吹唯心史观的反动实质。可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唯心史观和反革命妄想为转移的。他们反革命的妖风虽然吹起来了，用阴谋诡计搞颠覆的把戏也演过了，但其结果并不是他们改变了历史，而是历史审判了他们，也审判了他们反动的唯心史观。由此可见，两种历史观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我们一定要抓住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唯心史观和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准确地划清两种历史观和两条路线的界限，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

唯心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才开始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历史唯心主义一直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着统治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没有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也曾有过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提出过某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有些唯物主义者也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但由于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历史观在整体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提出过“环境决定意见”的唯物主义观点。爱尔维修认为，人是他的周围环境的产物，人的性格是由环境决定的，不良的社会风气是恶劣环境造成的。因此，要改变这种风气就必须改变环境。但环境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法国唯物主义者却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见的产物”，因而又提出“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唯心主义的公式。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就陷入了不可克服的自我矛盾之中。最后，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能够以自己的意见代表理性和真理的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物身上。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高阶段，但他曾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列宁认为黑格尔某些关于历史的见解中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为什么在马克思以前，对自然界的解释曾经出现过很多唯物主义的派别，而在社会观方面唯心主义却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呢？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这就是说，历史唯心主义之所以长期占统治地位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

首先，关于社会历史的解释直接同各阶级的利害有关，它不能不更多地受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剥削者拥有从事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精神活动的特权，而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全部加到被剥削者身上。因此，一切剥削者总是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要抹煞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而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总是把各种剥削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是由神的意志或什么“永恒的正义”、“人类的理性”所决定的，而否认社会现象的暂时性、历史性，否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见，剥削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要竭力歪曲历史，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只有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创立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

其次，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眼界。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充分暴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在资本主义一出现以前，封建社会的生产规模狭小，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不易看清纷繁复杂的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根源，难以认识社会的总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在历史观中占统治地位的客观条件和社会根源。

另外，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还有它特殊的认识根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是各种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力量。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没有自觉的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只是由于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表现为一定的有规律的客观过程。“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发生错觉，似乎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不是遵循着历史的客观规律。历史唯心主义者就是利用了和片面夸大了这个表面现象，把人的思想、意志，特别是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意志说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应当指出，社会历史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历史事件所构成的。每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性格、才智、意志的不同以及其他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各个历史过程的具体状况是不会完全重复出现的。如果仅仅看到这种表面现象，就会否认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规律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由个人意志所支配的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

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

毛主席指出：“人们能就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和历史条件。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最有前途的劳动者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个斗争目标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它能够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艰巨而又复杂的斗争任务，也要求无产阶级必须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同近代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客观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是不可能产生的。恩格斯指出：“在以前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深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得社会阶级关系简单化、明朗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并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发展的经济原因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打破了地方和民族的闭塞状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性、重复性，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在社会历史观中的根本变革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自参加并领导当时革命斗争的基础上，研究了大量的社会历史材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它内在的矛盾，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典型的社会形态的分析研究，发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历史所遵循的方法是唯物辩证的方法。他们认为对于人们的思想动机是应当研究的，但思想动机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要发现这个最终原因，必须进一步研究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在研究思想动机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力，通过思想动机的研究发现其背后的物质根源。这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唯一正确的途径。研究的结果证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根源是各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则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即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社会意识。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唯物主义根本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贯彻和发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严整的科学形式系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这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整法律、政治、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

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了这些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必然引起阶级斗争，引起社会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在社会历史观中引起了根本的变革。列宁指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历史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宣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彻底破产。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雾叠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着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前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这样一来，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唯物主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是指它在社会历史观中反期占统治地位的状况被推翻了，而不是说它不复存在。相反地，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后，资产阶级仍然顽固地坚持和鼓吹历史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一直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我们还要努力作战，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对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们不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中，认识知本主义的罪恶的本质，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而是从“理性”、“正义”的原则出发，构想出未来的社会制度，企图通过“天才人物”的出现和劝说资本家放弃剥削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是不能实现的。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自然而合理地麻于近往历史中阶级统治、阶级剥削的现象，指出阶级统和阶级剥削不能用人恶意来解释，它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而且这种现象在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不仅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且还准备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本身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样，社会主义再也不是什么“天才人物”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第一次把研究社会生活的各门学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它们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研究社会生活的各门学问只是积累一些片断的未加分析的材料，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因而还谈不上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只看到社会的思想关系，并把它当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这样就始终不能发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找不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也就谈不上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人们研究社会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来，把生产关系看作是思想关系的物质根源，这样就能够发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即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还把适应于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人们通过社会形态的研究，就能够把握社会的全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例如，尽管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但一般都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凡是奴隶社会，不管其民族特点如何不同，都充满着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封建社会，它的基本矛盾都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就是社会现象之间必然的、普遍的和不断重复的联系。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可靠的/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所谓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发展和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过程，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按照一定的客观规律发展、更替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门研究社会生活的学问提供了唯一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的科学，不能把它当作标签贴在实际社会生活之上。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商民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学习社会科学必须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行动的指南。历史唯物主义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装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七讲 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为了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散布的唯生产力论，推进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生活，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反复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对于社会发展的原因，不能从人们的意识中去寻找，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去寻找。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明确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为什么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呢？因为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并决定着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同时它贯穿于每一社会形态的始终，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每一社会形态的性质。

前而我们已经提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人们要从事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等活动，首先就要能够生存。为了生存，就必须有食品、衣服、住房、燃料等生活资料；而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离开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为了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其他劳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不可能生存，社会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们为了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去同自然界作斗争，改造自然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人们除了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生产方式。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进行的。因此，生产方式的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并决定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矛盾。

一个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由一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有怎样的生产力就有怎样的生产关系，有怎样的生产关系就有怎样的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道德等观点，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各种矛盾，如经济危机、失业问题、物价问题、住宅问题、社会公害问题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同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还决定着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就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生产方式就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必然带来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全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都是由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

然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是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因为经济基础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例如，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不打碎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批判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次，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生产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因此，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要考察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且要考察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一列宁在论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分析时说过：“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展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

总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们的有机统一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忽视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不可能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形态的本质，不可能了解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复杂的矛盾运动，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关系皮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它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发展。

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观察社会历史唯一正确的观点。与此相反，历史唯心主义者把社会发展的动力说成是伟大人物的思想动机，或者是

人类以外某种神秘的“绝对精神”。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在上一讲里，我们已经作了系统地批判。此外，还有一种错误观点，就是用地理环境和人口增长来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这也歪曲了历史发展的真相。

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就用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等）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决定人类的嗜好、气质，并通过这些决定整个社会制度。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还出现了所谓地理政治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政治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地理情况本身，要求向外扩张，掠夺别国的领土，以争取所谓“生存空间”。这种谬论是公开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辩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其根本错误就在于它不是从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而是从社会的外部去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有许多国家的地理环境差不多一样，但它们发展的差别却很大。同一国家，在地理环境几乎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苏联则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而这些国家的地理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整个地球以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环境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以若干万年为单位才显现出来，而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出它的变化来。由此可见，“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是从自然界取得的，特别像农业这样的生产部门受自然条件（土壤、水源、气候等）的影响更为明显。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生产的发展就会快一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生产的发展就会慢一些。就这些方面来看，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因为人类不仅仅适应自然条件，而且能够改变自然条件，自然条件的发现、利用以及如何利用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

某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人口因素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人口因素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条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虽然其他条件和别的地方一样，生产的发展可能慢一些；反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较多可能是生产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人口的增长决不能或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因为，第一，人口的密度不能一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不一定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国家；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也不一定是社会制度落后的国家。第二，“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种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第三，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不能成为引起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的原因。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硬说中国革命的原因是由于人口过剩。毛主席在驳

斥这种谬论时指出：“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乎每一次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最卑鄙无耻的辩护士之一——马尔萨斯企图用人口的增长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失业和贫困的现象。他提出了所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规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失业和贫困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而是由于人口太多。要消灭失业和贫困，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需要设法减少人口。现代资产阶级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更进一步用这种谬论来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奴役和屠杀殖民地人民的反动罪行作辩护。实际上，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规律”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捏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并不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生活资料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要快得很多。全部问题在于要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一切剥削制度，使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使劳动人民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

二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既然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地理环境和人口条件，而是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怎样才能认识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呢？这首先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要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生产力的特点

所谓生产力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它表现的是人同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即从泉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如原材料）。这三者是劳动过程的因素，也是生产力的因素。但它们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指出：“**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是因为，生产工具是由人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如果离开了人，就没有生产工具，有了生产工具，也不能起作用。劳动对象也要靠人才能改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是被动的东西，只有靠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才能有现实的生产力。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

在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是首要的。但仅仅有人还不行，还必须有劳动资料，首先是生产工具。人类劳动的特征就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比先前的社会形态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生产中应用了或者能够应用更进步的生产工具。

在生产力的因素中，劳动对象也不能忽视。因为生产劳动就是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引起劳动对象发生变化，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目的。有了劳动对象，生产力才能变为现实，生产劳动才会产生结果。

总之，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就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生产力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所谓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是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言的。就是说生产力不会长久地停留在一点上，它总是处星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这种特点是由社会生产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为了生活，必须不断地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在不断地积累和增长，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使劳动者逐渐改进生产工具，或者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每一次显著的改进，又使人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可见，生产力在客观上就有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生产中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一般说来，生产力是主要的，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

生产关系的特点

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在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们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进行生产，才能存在和发展，社会以外的孤立的个人的生产，是不会有。马克思指出：“**人们铤接产中不仅仅同包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滞转生产。为了送行**

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种在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二) 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三) 产品的分配形式。这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其中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类型，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关系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有制，一种是私有制。古代的原始社会、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公有制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协力，没有剥削和压迫；产品分配方式，在原始公社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由于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劳动者没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因而剥削者就能够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这样，在私有制社会中就形成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表现为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间的剧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内容是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则是相对稳定的。和生产力比较起来，生产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一是相对稳定的，多少带有保守的性质。某种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在这中间，生产力却不断的向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特点就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它们之间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

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力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力要求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了，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生产关系的出现，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使用石头工具的极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只能产生原始社会生产关系。以金属工具为主的较为进步的生产力，决定了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的产生。由于金属工具的改进，特别是冶炼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于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代替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从使用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出现同它相适应的某种生产关系。

1958年社会主义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群众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原来的高级社已经不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具体表现在：高级社社小力薄，无力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无力全面开展多种经营，往往是抓了粮食，丢了副业，顾了农业，就顾不上工业；高级社社小积累的资金少，买不起大型机械化农具，即使买得起，由于土地少，也不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因此，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进一步向前发展。具有“**一大二公**”特点的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就是反对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来自觉改变生产关系，反对在农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新生事物是骂不倒，轰不垮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公社茁壮成长的事实，彻底否定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谬论和他们妄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即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了全面复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也是无法磨灭的。

社会主义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人力和畜力。公社化后农业机械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全国来说，并没有根本改变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大体上以二、三十户组成一个生产队，便于组织生产和加强管理，便于使社员更好地关心集体，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客观上要求以生产队作为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单位，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不能随意变动。生产关系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唯物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关键。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同时，这一原理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而首要的生产力——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而生产关系是被决定的因素。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纯粹消极，完全被动的东西。这就是说，生产关系一经产生后，就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生产力。毛主席指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一般说来，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也会转化成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主席把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提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发展。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或是起促进作用，或是起阻碍作用。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合的时候，它就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它就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代最进步、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促进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的财富，劳动者运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进行生产，不存在失业问题，技术设备得到高度的利用，生产力的各要素都能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因而生产迅速发展。与此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和生产力的矛盾达到了严重冲突的地步。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存在着失业大军，技术设备利用率很低，生产力各要素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的障碍，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一般来说，生产的发展非常迟缓。当然，这里所说的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以为生产力发展已经绝对停止。从当前资本主义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社会生产中，既存在着阻碍甚至破坏的现象，也存在着某些部门生产增长的现象，特别是军事工业部门。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意思是说，这种生产关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和阻碍，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发展范围非常狭小，而且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地引起生产力的下降和破坏。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发展的辩证法总是这样：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必须是经济生活中迫切地提出了根本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时候，也就是生产力在某种生产关系上的内部已没有发展余地，不根本变革这种生产关系就不能使一生产力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历史上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又总是在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才得以实现的。例如，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经济上占了统治地位之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飞跃发展，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并在经济战线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实现的。这正是生产关系的能动作用的突出表现。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但这种矛盾在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情况。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合的，这时候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就为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还处在数量变化阶段，还不会、也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当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原来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了，这时矛盾日益激化起来，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由量变阶段进到质变阶段。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不适合又转化为适合，从而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

生产方式由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通过人们的自发活动到自觉的革命活动的过程而实现的。这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历史上每一代人开始生活的时候，必须适应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可能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其次，人们在旧的生产关系内部改进生产工具的时候并不理解这种行为会引起什么社会后果。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眼前的直接利益。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逐渐把石器改变为铁器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结果会产生奴隶社会；当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大机器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伴随大机器生产出现的无产阶级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但是这种自发过程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当新的生产力充分成熟起来，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体现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统治阶级就要竭力用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来维护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觉革命活动，才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时在先进阶级中间就会产生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理论。在这个新思想、新理论的指导下，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这就使历史发展由自发的运动进入自觉的革命活动。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总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过程和社会生活发展过程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虽然还存在着某些自发的情形，但由于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指导，因而自觉活动居于主导地位，开始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

上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这一规律所表示的，首先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要求有与之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如果不适合，迟早要变为适合，这是一定的、必然的。同时，这一规律也表示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它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生产

力的发展。所谓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并不是说它们之间不包含矛盾，恰恰相反，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和斗争，才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由适合到不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适合。适合，不适合，再适合，再不适合，这种形式，循环往复，而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革命变革，都使社会生产进入到高一级的阶段。

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呢？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产关系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能长远地落在生产力的后面。作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的生产力最终必然要冲破束缚自己的桎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革命阶级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生产力的解放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当劳动者已经无法在旧的生产关系下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冲击腐朽的生产关系。奴隶暴动冲垮了奴隶制度；农民起义推毁了封建制度；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必将粉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自己获得解放。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是由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决定的，是不可阻挡的客观的必然规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政党制订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政党必须在革命斗争中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这一客观规律。当生产关系（如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当建立了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就要使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某些环节上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正确，之所以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者，就在于它把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就在于它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领导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

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是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锐利武器。

“唯生产力论”是一种修正主义思潮。它是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炮制出的一种反动谬论。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国家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水平，农村经济分散落后，就根本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先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自然而然产生。1899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首先提出这种谬论。他认为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狂叫什么“诉诸武力的革命将成为无意义的词句”。叛徒考茨基也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胡说什么：“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叫嚷的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生产居于“首要地位”，是“党组织活动的中心”等等谬论，邓小平也炮制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所谓“工作重心”，也无一不是从老修正主义者的“唯生产力论”的黑葫芦中贩来的黑货。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政治骗子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一贯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对抗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就认为，要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全国解放前夕，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借口，大肆鼓吹“剥削有功论”，狂叫什么“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资产阶级“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全国解放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也提出“十大自由”的资本主义纲领，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抛出社会主义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鼓吹什么“现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技术革命是中心任务”，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又鼓吹什么“电子中心论”，胡说什么“技术可以引起整个社会变化”，“有了激光就有了一切”，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了一个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工业革命”新时期。这是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他们鼓吹这种唯生产力论的目的就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后，为了巩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邓

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继续贩卖唯生产力论，制造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等黑纲领，都说明了，“唯生产力论”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服务的。

这种唯生产力论是反马列毛主义、反辩证法的。它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水火不相容的。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和物的统一，是劳动者同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的统一；而入即劳动者是决定性的因素。唯生产力论则否认人是决定的因素，夸大物的作用，把生产力简单地归结为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指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并不是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的因素。唯生产力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根本否认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和在一免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作用，根本否认在变革生产关系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群众自觉革命活动的重大意义。这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篡改成了机械决定论。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阶级斗争。离开社会内部的矛盾，离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无法解释社会的发展。唯生产力论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仅仅抽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可避免地要滑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因为离开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来谈“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就必然要把这种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一种精神的力量。事实正是如此。唯生产力论的祖师爷考茨基曾经供认：“物质生产力之最深切的基础就是精神过程——认识自然的过程。”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认为“增加生产，发明机器”是“从各种科学来达到”的，把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科学”的进步。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心主义性质。

历史上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五种基本的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简陋的石器，生产力水平很低，这就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归原始公社所有，人们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生产所得只能勉强满足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剩余产品，因而没有剥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原始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产生了私有制。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金属工具的出现，劳动产品有了一点剩余，这就造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只有采取最粗暴的剥削方式，才能从他人的劳动中压榨剩余产品。于是，原始社会便合乎规律地由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占有制所代替。

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并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对于奴隶可以象对待牲畜那样任意地买卖和杀死。这是一种最残暴、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奴隶占有制度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由于大规模地利用奴隶的简单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古代中国、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宏伟建筑和巨大的水利工程，都是奴隶劳动创造的。奴隶社会的状况最清楚地说明一小撮剥削者是靠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的，全部社会财富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创造历史的是千百万奴隶，而不是什么“英雄”。

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在它产生之后曾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奴隶制是建立在对广大奴隶极其残酷的剥削之上的。因此，它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很有限的。奴隶在奴隶主的残酷剥削之下成批地死亡，还能够活下来的奴隶不断用破坏生产工具、怠工、逃亡和举行大规模的起义来反抗奴隶主的统治。这就使得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再也不可能向前发展了，奴隶制的存在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生存。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出现有一定程度的生产积极性的劳动者。奴隶暴动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于是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封建地主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农民。地主把土地交给农民耕种，以收取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和奴隶比较起来，农民有可能建立归己的小私有经济，在把生产所得的大部分产品交给地主之后，还能多少有一点归自己。这就使得农民有了从事生产的一定程度的兴趣和主动性，不再象奴隶那样经常地破坏生产工具、怠工和逃亡。在奴隶制再也无法存在下去的情况下，这是统治阶级唯一能够采取的剥削形式，同时也是唯一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分门别类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金属冶铸、农田水利、蚕桑业、陶瓷业、煮盐业、酿造业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功绩。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同样陷入了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之中。这首先是因为地主阶级利用地租、人身依附的关系，（也叫超经济强制关系）对农民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在封建剥削下，农民愈来愈贫困、破产，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而且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下去。封建的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引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其次，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从基本上以供自己消费为目的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里产生出了纯粹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产生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随

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扩大，城市的繁荣，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增加而生长和壮大起来，要求打破分散的、个体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更大的范围内和以更大的规模自由地发展生产力。这就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为了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给商品生产的发展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资产阶级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地主阶级的力量，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多次的反复斗争，终于推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靠受雇于资本家而生活，成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是靠残酷剥夺广大劳动人民而建立起来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曾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用由千百万产业大军进行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分散的个体的手工劳动，并且日益广泛地把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中去。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大，还要多。

但是，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把原来许多小生产者个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变成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把个人单独进行的生产活动，变成了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进行的活动；把个人单独完成的产品，变成了许多工人共同完成的产品，生产已经社会化了，但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并不是由千百万劳动者占有，而是由少数资本家所占有，这就造成了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增长的可能性和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发展，引起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断贫困化，引起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的集中一天比一天加强，最后形成了由一小撮大资本家所把持的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操纵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但它不仅没有消除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没有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起来，引起了瓜分世界、争夺原料产地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它绝对不可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解决。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变革的历史。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是全体劳动人民共有的财产。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占有这些生产资料，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统一的合理的调度和使用，以增进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的劳动力和产品，国家可以统一调拨。这种所有制是同现代工业中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又一种形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不是全国劳动者的公共财产，而是以一个一个的集体经济为范围，分别属于各个集体经济（例如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范围的劳动者共有。它主要是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组织共同劳动，生产的产品除以税收的形式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外，其余都归集体所有和支配。这种所有制是同目前社会主义中国农业和手工业中社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属于资本家私有，而属于劳动者的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不再分离，而是直接结合起来。生产的不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剥削和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满足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而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使人力、物力、财力得到合理的使用。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无法利用的自然界。**”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以往一切生产关系相比较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为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解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点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1948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解放以后的二十二年，

钢的生产就达到了两千一百万吨。1971年和1949年相比，增长了一百三十多倍。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四十吨自卸载重汽车的成批出厂，社会主义中国自己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万吨远洋巨轮下水，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等等都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水平。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生产比解放前也有很大的增长。1949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两千一百几十亿斤，到1971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增加一倍多。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中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越得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进了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恶毒诬蔑和咒骂社会主义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农民缺吃少穿”，什么“国富”了，“民穷”了。他们抛出了一个所谓“民富国强”的反动纲领，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究竟要谁“富”？要谁强？这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加以分析，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铲除了贫穷的根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由穷变富了；相反，地主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失去了剥削的物质手段，则由富变“穷”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谓的“民”，就是指的二十几年来被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专了政的地、富、反、坏、右。他们所说的“穷”，是指的被我们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穷”。他们要搞的“民富”，就是要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夺回被剥夺的生产资料，复辟剥削制度，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他们所要建的“国”，就是保护这种剥削制度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

一类骗子要搞的“民富国强”就是要地主资产阶级“富”，要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叛徒、特务、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强”，就是妄图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回到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去。他们的这一套，和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妄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发出的叫嚣完全相同，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只要“国计”，不要“民生”，“整得大家都穷了”。由此可见，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民富国强”的纲领，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纲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巨大的优越性，它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并不是说它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所有制方面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分，例如，社会主义中国在对社会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所有制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但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又如，在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还存在着少量的个体经济。从人和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方面来看，那些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阶级对立的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同志式的关系。在个人消费品分配形式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对于留用的资本家还付给高薪，这种高薪，并不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而是一种赎买；此外，也还有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乎按劳分配原则的旧的工资制度的残余。所有这些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它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它和生产力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继续对这种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地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也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就所有制方面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形式。由于公有化的水平不同，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程度和办法不同，因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两种所有制的矛盾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问题。由于农民的生产属于集体所有制，农业劳动产品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而不是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在进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时，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也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原来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后来由于生产大跃进，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有更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于是出现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在现阶段还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将来必然要过渡到以大队为基础，乃至以公社一级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再进一步，还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在国家所有制中也有某些具体的关系，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一定的调整，例如中央和地方在生产的管理体制上的关系，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经营范围的划分等等，这些也都是矛盾，必须注意及时调整。

从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也要在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

下来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得到妥善的解决，同样不能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内，总有限度，但在这一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却可能是不断变革的。对于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采取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安排工农业之间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适当地安排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实行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的原则等方法来加以调整。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采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对于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的矛盾，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办法来调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劳动群众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

从分配形式来看，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尚不具备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第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还存在，各个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数量和质量）还有相当的差别；第三，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没有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还未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才有利于发挥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是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它否定了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平等，从未有过的合理。但是，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按照这个平等原则进行分配，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富裕程度的差别。我们既要承认这种差别，又不能扩大这种差别。如果处理不当，差别过大，就会产生收入悬殊的现象，在收入过高的人们中间就会在一定情形下出现实际上的剥削行为，就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为革命生产的社会主义觉悟，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为了正确贯彻这个原则，还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分配中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定额，工资制度等等）适时地予以调整 and 解决。

在社会主义的分配中，还经常出现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就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利于生产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即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同生产力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同生产力发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讲，“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发生对抗。资产阶级及其混进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代理人竭力扩大和发展旧制度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中饱私囊、培植新资产阶级分子，妄图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要求逐步清除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要求及时地变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的部分，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就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社会的基本矛盾，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外，还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因此，为了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必须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但是，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不能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例如，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是很高的，但是美国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也是由资本主义思想占着统治地位，因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直接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的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

所谓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末，如何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呢？现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在某一具体社会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几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外，有的国家还残存着封建的，甚至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这些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某一具体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诸方面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等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面貌及其发展方向。所以只有把居于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把这一社会形态同另一社会形态区别开来。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者是旧经济基础的残余，或者是未来社会的新经济基础的因素，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某一具体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经济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剥削的关系上的，因而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阶级社会一切领域中的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剧烈的阶级斗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这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而且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关系体现在各种政治制度中，体现在政权、法律、军队、警察、法院、党派团体的组织活动等全部国家机器和政治结构中。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政治观点、法权观点、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上层建筑就是由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部分构成的，而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指导并与之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就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建立起来的，它直接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一定的意识形态，也总是要求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同它相适应，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政治的和文化的机构、设施通常都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因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政治（包括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居于主导地位。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观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都是从属于政治的。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是一定社会政治的反映。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都直接地或间接地贯串着政治斗争的内容。

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从来就是阶级的上层建筑，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所以需要建立起一定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用它来维护、巩固本阶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为本阶级的经济基础服务。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竖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就是资产阶级手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巩固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位，镇压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社会主义中国的上层建筑，就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镇压地、富、反、坏、右和不法资本家的工具。抹煞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是错误的，是反马列毛主义的。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就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由此就能够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过五种基本的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特定的上层建筑。任何经济基础以及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都不是永恒的，因而任何社会形态也不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需开具体的社会形态而空谈什么“一般社会”，其实质就在于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性，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作辩护。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复杂的，“单纯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里，都有一种生产关系占居主要地位，它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规定着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同时，在这个社会形态里，还存在着前一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也会出现即将产生的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新的政治思想（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物质前提，而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又使这个社会形态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时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参杂其间。”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某一社会形态，必须对这种复杂的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首先找出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又要注意到存在于这个社会内的旧制度的残余或新制度的萌芽。具体地分析一定社会形态的复杂情况，对于把握它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个统一体中，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般说来，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主要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性质，归根到底要由经济基础来说明。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人对人的剥削和因此而形成的阶级对抗，因此，像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是根本不存在的。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以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就产生了以地主阶级的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内容的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统治地位，就产生了以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内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包含着阶级对抗的内容，表现为对立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

其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旧的经济基础让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后，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当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的变化时，也会引起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它们的变化各不相同，有的早些快些，有的晚些慢些。如前所述，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处于主导的地位，它是阶级利益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因此，上层建筑的变革，首先就是国家政权、政治法律制度等的变革，就是按照一定的政治路线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哲学、艺术、道德等观点的变化则比较晚些慢些。上层建筑的变革，不应理解为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它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实际情况是，新的经济基础形成之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还会存在着。认为经济基础一经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就会立即彻底变革的观点是错误的。还应当指出，上层建筑的变革，不是和平实现的，而是一场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逐步肃清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使上层建筑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斯大林指出：“**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而且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还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上层建筑对于社会的发展，可能起革命的推动的作用，也可能起反动的阻碍作用。上层建筑作用的性质，取决于它所维护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当它维护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济基础，帮助新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的时候，那就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就起着革命的推动作用；反之，当它维护的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基础时，那就要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发展就起着反动的阻碍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先进的，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曾对生产力的解放，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腐朽透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为这种过了时的、腐朽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就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例如，美帝国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宣传工具，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对外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破坏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样，处于内外交困的苏修叛徒集团，也是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首先是使用反革命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今日的苏联，谁要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敢于说话，敢于反抗，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进“疯人院”。苏修叛徒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工人罢工和群众反抗进行血腥镇压。苏修叛徒集团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实行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们疯狂地摧残和压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而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到处泛滥。他们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文学艺术作为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这种上层建筑的反动作用就在于维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腐朽的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是怎样为经济基础服务，怎样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呢？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要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更具体地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自己的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以巩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通过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来大力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其他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斗争，以保证自己的思想统治。建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是建立和巩固经济上的统治的保证，是上层建筑帮助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的表现。显然，上层建筑的这种能动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紧密相联的。如果统治阶级能以国家政权的力量和政治、思想的影响，战胜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反抗和政治、思想的影响，就能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过程中，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逐步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战胜统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影响，那就必然要引起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衰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继续维持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如果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宣传还能够欺骗人民群众，那末，资产阶级就仍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它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暂时不至于崩溃。所以，要摧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斗争，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造成革命舆论，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然后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首先向旧的上层建筑开刀，造成舆论优势，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的上层建筑，然后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巩固或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如前所述，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上层建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地、绝对地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总不可能立刻就充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阶段，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某些局部的质变，经济基础中的这种变化，不会立刻就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这样，就会不断地出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某些不适应的情况，发生某种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上层建筑维护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一般地不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通过适当调整使的办法，使之逐步完善加以来解决；另一种情况是，上层建筑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时所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反动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同它相适应了，于是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而反动的上层建筑却竭力阻碍这种变革。这种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它不可能在旧制度下得到解决，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摧毁反动的上层建筑，才能解决。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产阶级以法西斯的政治统治来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维护已经腐朽的经济基础，阻碍它的变革。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崩溃，而上层建筑却要求它永世长存，这种极端反动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变革要求之间发生了根本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

综上所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化先于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这就构成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的规律是这样的：某种上层建筑的建立，在其初期是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当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阶级社会里，这个变革的过程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实现的。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进一步揭穿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唯生产力论”在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同时，还竭力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胜利的时刻，鼓吹什么“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一个时期以某一种为主，而其他的几种捎带着点边”。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政治革命“为主”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进入一个以发展“生产技术”为主的“经济革命”的新时期了。至于什么生产关系的革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统统列为“捎带点边”，靠边站了。在十月反革命政变之后的资本主义复辟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又炮制了“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等反动谬论。这些反动谬论，完全是“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它根本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妄图利用革命形式有转换的可能，玩弄诡辩手法，以生产代替革命，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利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并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永远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略方针。它科学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抓革命促生产就是根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进行革命，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不发动广

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一会儿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一会儿又说“军事就是最大的政治”，“工人做好工，农民种好田，就是政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制造混乱，妄图用资产阶级政治代替无产阶级政治，用资产阶级政治冲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冲掉无产阶级各项事业，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识破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说，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同旧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法律制度中，最主要的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法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产生、形成以及两者的矛盾性质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以往一切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自觉地建立起来。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前提。在这里，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这是否违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呢？没有。相反地，它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般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这是因为，首先，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能够建立，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决定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冲突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发展到相当集中的程度，使得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就能够立即从资产阶级的手里，把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各种企业接收过来，把它们改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的企业，从而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给无产阶级国家以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持。其次，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有到了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时，才能逐步地巩固和完善起来。

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经过一个改造多种经济成分的过渡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国民经济中，既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有其他的经济成分（主要是个体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运用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思想，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一步一步地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改造其他经济成分，以便使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杨献珍一伙为了反对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们玩弄诡辩手法，认为过渡时期既然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又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所以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能够平衡地互相御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很明显，这种反动谬论，抹煞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取消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否认了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妄图在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各个领域内全面地搞阶级合作、阶级投降。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中国永远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杨献珍这套反动谬论一出笼，当即受到无产阶级的迎头痛击。革命导师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指出了它的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1956年社会主义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实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理论上遭到了破产，而且也被革命实践所彻底粉碎。改革开放之后，修正主义头目邓小平及其御用理论家又炮制了“我们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经济结构也是社会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邓小平鼓吹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根本原则，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合法化、制度化，为复辟资本主义打开大门。他打着“发展生产力”的幌子，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否认阶级斗争，掩盖所有制性质，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一反动谬论不仅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更在实践中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必须坚决批判。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也有自己的特点。毛主席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杠杆，而且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调动和发挥着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保卫着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保证。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启发和教育下，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马列毛主义为党和国家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它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要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开展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反抗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矛盾斗争就更加突出起来了。资产阶级凭借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顽固地同无产阶级继续较量，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如果我们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放松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斗争，那就会丧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讲中作专门的论述。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在适应中也还存在着不适应的方面，也就是说，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构里，还会产生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出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有这些上层建筑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和阻碍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就利用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势力，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篡夺了我们一部分权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单位的领导权，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群众手里。此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家机构中还存在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这也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讲，又分两种：一种是敌我矛盾，例如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这种矛盾只有通过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揭露、批判并实行专政的办法才能解决。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但这些矛盾和斗争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另一情况是由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某些环节上的不完善而引起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一建立起来就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虽然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前，它是相对稳定的，但仍然有着不断的量的发展和某些部分质变。所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会产生某些矛盾。例如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由于旧的影响和缺乏经验制定的某些规章制度不适应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矛盾，就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及时调整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来解决。

从上面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因为无产阶级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部分，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而资产阶级及其混入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力图阻挠和反对这种变革，妄图扩大资本主义阵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就构成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按照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在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一场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类骗子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革文艺，改革教育，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办“五七”干校，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等等，这一切对于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毛主席指出：“**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第八讲 阶级、国家、革命

上一讲所论述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回答了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进一步问，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是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来实现的。

本讲的基本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学说。

一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的产生及其实质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期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是，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讲，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阶级的存在是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在人类的早期——原始社会时期，没有产生阶级的可能。因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必须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才能维持整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剩余产品，没有剥削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阶级的存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提供了剥削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产生阶级的可能性。由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社会分工是原始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阶级分化的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起初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后来发展到公社内部，即个人之间的交换。列宁曾经指出：“**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自己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立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个人交换，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的产品日益扩大，社员不关心公社的集体生产而致力于个人的生产，这样就必然要逐渐破坏公有制，扩大私有制，造成财产的不平等，导致阶级的分化。

这种阶级分化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而产生的呢？恩格斯说：“**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第一条道路是，在原始公社中担任着某些“社会职能”的人，如族长、酋长、军事首领、祭司等等，他们利用职权侵占了一部分公共财产，包括利用战争掠夺的方式来发财致富。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担任公共职务的人，开始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对于保护公社的共同利益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口的增加，各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或冲突也增加了，这些社会职能的“独立性”也日益加强，以致于“**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于是，这些“**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最后“**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接着，恩格斯说：“**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这就是，“**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的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这种劳动力开始来源于战俘，以后本部落的穷困的人，也常常被迫成为奴隶，而富有者则成为奴隶主。这样，人类社会便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进入了第~个对抗的社会——奴隶制社会。

由此可见，社会划分为阶级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其中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历史上有一种“暴力论”（杜林就是鼓吹者之一）认为，政治上的暴力，军事上的掠夺是阶级产生的原因。这是完全错误的。战争和暴力的阶级的产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不是阶级产生的原因。其实，在阶级产生以前，各部

落之间为争夺狩猎场地等原因而发生武装冲突早就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阶级的分化，当时由战争所获得的一切战利品都归公共所有，平均分配；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侵占集体的战利品才成为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这说明战争本身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战争所获得的财产归谁所有，如何使用，倒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正确理解阶级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的实质。列宁曾给阶级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就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的这一科学定义全面地概括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本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第一，这个定义指出，阶级是和历史上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是因为它们在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例如，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处于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后者处于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第二，这种地位的不同，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决定的。统治阶级占有全部和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而被统治阶级则不占有或很少占有生产资料。所以统治阶级能够利用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占有他们的劳动，并且实行政治上的压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通常以财产关系的形式用法律固定下来。第三，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又决定了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尽管人数很少，但因为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因此在生产中居于指挥地位，起“管理者”的作用，而广大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却变成了所谓“执行者”，承担了全部繁重的体力劳动。第四，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也决定着各阶级取得他们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例如，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获得社会收入的大部分，而工人则以出卖劳动力而换取工资的方式获得其微小的收入。很明显为列宁所揭示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四个特征，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能任意丢掉某一特征，或者孤立地以某一特征作为社会的阶级划分的依据。但是，各个集团对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一点是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他特征都是为它所决定的，由它而产生的。所以，总的来讲，阶级的实质，就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因而一个集团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算理解了阶级的本质。

列宁的阶级定义，为我们划分阶级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标准。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列宁的阶级定义来规定划分阶级的标准的。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谈到怎样划分地主时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贫农则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或者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在每一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都有两个基本阶级，在奴隶社会有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有封建主和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还存在着若干非基本的阶级和集团。如奴隶社会中，有既非奴隶也非奴隶主的“自由民”，在封建社会中，有从事个体劳动的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个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等。此外，在各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其阶级地位分别属于他们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生活通常依附于剥削阶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大多数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在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知识分子发生剧烈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会走向劳动人民方面，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列宁关于阶级的科学定义，说明了阶级的产生和划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决定的，任何离开社会经济本身的原因，去解释阶级的起源和划分都是错误的。但是阶级一经产生之后，就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冲突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来。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并且只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才能巩固其经济上的统治。所以，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于社会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要划分阶级，或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只能以经济的原因（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标准；但是要认识各个阶级的状况，掌握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或者要判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就必须对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例如：剥削阶级在经济上被打倒了，但并不等于就消灭了阶级，因为这些人还在，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因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都说明了政治、思想对于经济的巨大影响。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只有这样，才能深刻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正确把握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阶级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和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或者把阶级说成是自古就有的，万世永存的，或者抹煞阶级斗争的存在；或者歪曲划分阶级的原因。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大肆散布“分配决定论”，

他们胡说什么“又欠账，又不够吃，这是贫农。又欠账，又不够吃，搞点什么事才够吃，这算是中农。不欠账，又够吃，又做点生意，这算富农。”他们把阶级差别仅仅归结为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以此来掩盖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们又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阶级已基本消灭”现在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他们，鼓吹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一种烟幕。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他们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不仅在经济领域内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而且还在政治上、思想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已反复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所证明。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了新的理论概括。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出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其重大的发展。我们必须以此为武器，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把这一伟大革命精神用于当前革命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中。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如前所述，所谓阶级就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能够统治另一个集团。阶级斗争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是二者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表现。

一定的阶级利益是由这个阶级在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按照它所处的这一客观地位，无产阶级最关心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则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在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三个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对抗的阶级，它们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只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因为：

第一，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和旧的生产关系发生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为它服务的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只有依靠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使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成长，才能使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所以，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的质变，就没有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第二，就是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阶级斗争，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奴隶和农奴都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斗争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但是对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仍然是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封建主的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从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朝的李自成、清朝的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战争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欧洲罗马帝国斯巴达克所领导的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动摇了奴隶主统治的根基。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领导的，但是他们必须借助于农民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广大的农民群众，才是反封建的真正的主力军。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动农民越彻底，那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彻底。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广大劳

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离开阶级斗争就不能说明阶级社会的任何现象，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总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消极的破坏力量，看成是“社会的病态”，竭力宣扬阶级合作，说什么阶级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和他们在史学界的代理人所鼓吹的“让步政策论”就是这种阶级调和论的最典型的代表。“让步政策论”者说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还编造了一个所谓封建社会发展的公式，即农民起义—统治阶级让步——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繁荣的“太平盛世”。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是农民阶级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而是在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王朝“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向农民作些让步”、“中国历史的暴力革命大多是因为‘皇帝没有改革’，如果统治者及时减轻赋税、放开言路，就不会发生流血冲突。”，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这种“让步政策论”是美化封建统治阶级，诬蔑农民革命战争，抹杀阶级矛盾，鼓吹阶级合作的反动谬论。事实上，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么“让步”？秦末农民起义之后，汉王朝并没有向农民让步，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唐王朝也没有向农民让步。清王朝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沉重打击下，宁可出卖主权，勾结侵略者绞杀革命，也不向人民作丝毫让步。农民起义失败之后，新王朝上台，由于人民贫困破产，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不是向农民“让步”，而是地主阶级的复辟和倒算。地主阶级以此为诱饵，把徭役和地租等封建剥削重新加在农民身上。在封建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太平盛世”。地主阶级的“盛世”，就是农民阶级的地狱。“让步政策论”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合作，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证明，不论在社会更替的质变过程中，还是在同一社会形态发展的量变过程中，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着阶级。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本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人们的立场、思想、感情等等，都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是用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性作为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则，把抽象的人性作为人类生活的准则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这是极为荒谬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等级制的统治，把人从神学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反对神权、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终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劳动人民带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所讲的人性，人权和个性自由，都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他们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就逐渐由革命走向反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人性论就成为帝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同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成为地主资产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掩盖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竭力鼓吹“仁义道德”、“人类之爱”一类骗人的鬼话，大肆宣扬“普遍人性”，把自己打扮成“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其目的是欺骗和蒙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革命人民的阶级意识，也大肆贩卖人性论的黑货。赫鲁晓夫胡说什么“人总是人，不管他属于什么阶级”，“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加兄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塞进苏修的“党纲”，用它来代替消灭阶级这个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库中，拣起人性论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胡说什么人性是“人的自然本质”，“我们的党性就是人性”，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孟之道，鼓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则玩弄诡辩手法，抹杀阶级区分，胡说什么“历史是人创造的”，用抽象的“人”来掉换“人民”这个阶级的历史的概念，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打扮成代表全人类的“英雄”，抬上“历史创造者”的宝座。他们还鼓吹一种超阶级的“为公的哲学”，“为公的新人”，邓小平更进一步，把人性论应用于制定经济政策，鼓吹“过去我们说讲奉献，不讲报酬，那是政治挂帅，现在要讲调动积极性，靠报酬、

靠物质刺激。”以复辟资本主义，这些都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人性论披上伪装，以便欺骗群众，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人性论者抹杀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在政治上就必然要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只承认民族斗争，不承认阶级斗争，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和服从国民党蒋介石。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也是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发表反共文章，吹捧卖国贼蒋介石是什么“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的“最高统帅”，要求“一切中国军队服从”国民党“统一的司令部”，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全国解放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又宣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胡说资产阶级剥削是“救人”，“剥削越多功劳越大”，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不作阶级分析，大谈什么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叫喊什么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好人”“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来”，现在则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反对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斗争，统统不合人性。因此他们要为“民”请命，对那些牛鬼蛇神就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对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则要实行“严厉镇压”。他们还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感情拉山头，搞宗派，结死党，拼凑反革命的黑班底，妄图用阴谋手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枪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所必然引出的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坚决肃清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在自己头脑中的流毒，认真学习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保持清醒头脑，识别真假马列毛主义。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阶级社会中最重要、最客观的事实。阶级斗争贯串在阶级社会的始终，贯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如果不把握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就不能把握社会运动、社会生活的规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把这种理论用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根本方法。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这个方法分析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情况，分析各阶级的历史变化和动向，分析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对革命斗争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为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正确地运用这个方法，必须明确和作到以下几点：

第一，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进行阶级分析的首要前提。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活动，都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代表本阶级的利益的。所以，不同阶级的人对待事物的认识和态度是绝然不同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发展规律完全一致，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但不妨碍我们正确地认识事物，而且恰恰是我们正确认识事物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一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决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他们必然要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和运用无产阶级的这一科学的革命的方法，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社会中，揭露事物的阶级本质，辨别哪些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哪些是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从而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第二，进行阶级分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分清敌我，正确的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粉碎阶级敌人的进攻，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是说，区分敌、友、我，确定打击谁，依靠谁，团结谁，这是关系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的首要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进行阶级分析，首先要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因为经济地位是决定人的阶级性和对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的首要原因；但是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的分析，也是阶级分析不可缺少的方面。毛主席一贯从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各个方面去进行阶级分析，从而引出正确的结论。进行阶级分析，还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各阶级进行深入细致的阶层分析。在这方面，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例如，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所处的国际环境，毛主席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时期，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为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分为尚能抗日的方面和坚决反共的方面，甚至对汉奸亲日派也一分为二，即分为亲日的方面和动摇的方面，如此等等。党的各项不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些关系的区别上。如对反共顽固派的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等等。毛主席说：“**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同样的原则制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一再强调，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下，都必须解决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工人阶级

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一小撮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三，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作好调查研究，随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级、阶层都会以不同形式来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了及时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主席说：“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那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那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那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离开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阶级分析，就必然要产生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和主观主义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陷入右倾机会主义，就是陷入“左”倾机会主义。离开了阶级分析，调查研究也会失去方向，结果是情况、数字一大堆，但是听不到阶级的声音，摸不着阶级的脉搏，看不见阶级的要求，这样的调查材料再多也是没有用的。当然，由于阶级敌人采用欺骗隐蔽的手法，不敢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直接暴露出来，甚至于产生一些假象，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复杂，只要通过对阶级根底等一系列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观察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分析它背后的阶级目的和阶级要求，就能透过复杂的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帮助我们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

总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离开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正确地估计革命形势，分清敌友，就必然要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当前，我们在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时候，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

阶级斗争贯串于阶级社会的始终。阶级斗争一般都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三种形式。我们这里主要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最早采用的斗争形式。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自发阶段。列宁说：“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经济斗争有许多形式，罢工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

在这种斗争中产生了无产阶级最初的组织——工会。经济斗争对改善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逐步增强阶级意识，锻炼战斗的能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经济斗争有很大的局限，经济斗争不管取得多大胜利，它只能略为减轻工人所受的剥削，而不能彻底消灭这种剥削，只能暂时改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不能根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它只能起“止痛剂”的作用，而不能“铲除病根”。因此，绝不能夸大经济斗争的作用。只有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政治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它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主要的、决定的形式。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比较，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经济斗争保卫的只是工人眼前的、日常的利益，而政治斗争所完成的任务则体现无产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经济斗争往往只是无产阶级中的个别部分反对本企业的资本家，而政治斗争则是整个无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对抗；经济斗争如果脱离了政治斗争，只能走向工联主义的道路，而政治斗争则要求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养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懂得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了解本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阶段转入自觉阶段。政治斗争的具体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参加议会斗争，组织群众示威等等，但是政治斗争最高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仅仅靠合法的议会斗争是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如果把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仅仅限于合法斗争的范围以内，那就是十足的改良主义。从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到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鼓吹“议会道路”，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可耻背叛。

为了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必须进行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推翻或和巩固一个政权，必须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除了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无产阶级外，还在思想上欺骗和奴役无产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不进行反抗。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冲破各种反动思想的束缚，特别是要扫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对无产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自发的工人运动本身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思想，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政党的领导。它的作用就在于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

总之，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而又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如经济主义等企图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永远局限于经济斗争的范围以内，胡说什么既然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有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对于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来说就应当具有首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这‘所以’一词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从经济利益有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当作出经济斗争（即工会的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熊用根本的政治改革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斗争的艺术就在于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巧妙地把这三种基本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由一个胜利引向另一个胜利。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要能够正确地确定革命的战略策略和运用各种斗争形式，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又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就是说，只有共产党这样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党，才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因为：

第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它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能够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第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它有为全体党员所自觉遵守的纪律；它能够经常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它把全体党员组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

第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部队，因而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如工会、军队、政权机关等等。它能够同本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第四，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和战斗司令部。由于上述原因，共产党能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行最坚强的领导，能够把这个斗争引向一个总的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战斗司令部。

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要不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共产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自发论”，胡说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反对“**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担负起领导革命的任务，根本的问题是要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路线对了，力量弱小可以发展壮大，没有武装可以建立武装，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革命就会受挫折，已经得到的成果也会丧失。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本国的现状、历史和本国的特点，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使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从斗争的实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再来指导斗争的实践。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证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就必须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正确的政治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

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不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并战胜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力图从思想上影响、腐蚀和“溶化”共产党。如果不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进行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就不可能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就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只有拿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批判武器，坚持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才能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国家学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科学地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以及国家历史形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国家问题。

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国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它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历来的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总是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一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所以把国家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有所谓“君权神授说”认为国家是根据神意产生的，把人对人的统治解释为神对人的统治。这当然对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是很适合的，但对于正在要求统治权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不利。为了对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神权思想，资产阶级力图用人性来解释国家的起源。法国的卢梭提出了一种“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根据人们的互相约定而形成的。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理性的造物”，是“道德观念的体现”。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的国家观就变得更加反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竭力崇拜英国资产阶级学者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把人类比作动物的机体，工人担任营养的系统，商业资本家担任分配的系统，而工业资本家则统帅全体，担任调节的系统，国家就是一个调节各系统的活动的机关。帝国主义就是根据这一理论提出“国家至上”的反动观点的，所谓“国家至上”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至上。邓小平曾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阶级斗争为纲”等言论，强调国家是“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机器”，主张“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宣称“只要发展经济，国家强大，就是好国家”，这些观点实质上淡化和否认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掩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属性，将国家描绘成一个超阶级的管理机构，助长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他推行的“黑猫白猫论”同样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使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机器重新掌握统治权。所有这些观点都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和“超阶级的”东西，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

那末，国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的实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也不是“人类天性”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国家和阶级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

在原始公社时期，因为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国家。氏族公社的居民是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那时虽然也有管理公共事物的机关，如在希腊人那里有部落的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等，但它们都不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构，而是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那时也没有和人民分离的武装部队，全体成年男子都看武器（同时也是生产工具），仅在必要时，（如争夺守猎场地）才与敌对的部落作战。

但是，社会划分为阶级，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阶级的出现把社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集团，不同的阶级在经济上是根本对立的，奴隶主对奴隶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引起奴隶阶级的反抗。这种新的阶级矛盾，依靠原氏族公社的管理机构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因它除了依靠传统习惯，舆论压力和首领所具有的威信以外，再无其他任何强制的方式。这样就需要有一种属于某个阶级的、专门从事镇压敌对阶级的机构。特别是由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只占人口中的少数，被剥削者总是多数，少数人要剥削多数人，就更需要有这种专门的暴力机关。这个专门用于统治别的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工具便是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列宁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可调和和用武力解决的阶段和程度时，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由此可见，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如果阶级矛盾可以调和，就不会有国家。国家的作用在于“缓和”阶级冲突，力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统治阶级的“秩序”范围内。因此，国家实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工具不是各个阶级所共有，而是一个阶级所专有，这个阶级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它掌握这个工具就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而决不会一视同仁地为社会上的各个阶级服务。既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就必须打破以前的氏族和部落的关系，而按地区来划分行政系统，层层设置统治机构。为了保障统治阶级意志的执行，它就必须使武装和人民分离，建立特别的武装部队，此外还必须要有察警、法庭、监狱等等暴力组织，其中军队是国家的主要成分。毛主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十分明显，如果国家不拥有

暴力镇压的手段，它就不能起到“缓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把阶级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这里要指出的是，缓和同调和是根本不同的。所谓“缓和”就是剥夺被压迫阶级一切足以威胁现存制度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也就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一切公开反抗。

国家的职能

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职能是国家本质的表现。学习有关国家的职能的问题，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国家本质的理解。

任何国家都有两种职能：一种是内部职能，一种是外部职能。内部职能表明这个国家在社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外部职能则表明该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两种职能中，一般说来，对内职能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对外职能则是对内职能的继续。

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职能，就在于对内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把阶级之间的斗争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以保证剥削阶级的统治，对外侵略别的国家或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止别国的侵略。剥削阶级的国家在执行它的对内、对外职能时，经常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和平”的手段，一是战争的手段。这两种手段或者交替使用，或者同时并用，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剥削阶级利益。所以，当剥削阶级使用“和平”的手段时，这绝不是什么施“仁政”，绝不是什么对于人民的“让步”，它既以暴力为后盾，又以达到暴力统治为目的，只不过不像战争手段那样露骨而已。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有两种职能，即对内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组织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外防御帝国主义的颠覆和可能的侵略。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任何向外扩张和向外侵略的必要，而且还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积极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迫压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国体与政体

同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采取议会民主制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法西斯专政的形式，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政权形式，它始终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一贯夸大政权组织形式的区别，来掩盖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硬说成是所谓“民主”、“自由”国家。其理由是这些国家里有议会民主制。为了揭穿这种诡辩，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两个范畴加以区别。

毛主席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政体，“**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国体问题表明这个国家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去统治、镇压哪些阶级。历史上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国家，所有的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封建地主专政的国家，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只有根据不同的国体来区别各种国家，才能把握各种国家的阶级本质。至于政体，只是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它表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去实现自己的统治。如果仅仅依据政体的不同来区别各种国家，就会使人忽视各种不同国家的阶级实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诡辩，正是利用用议会制这种虚伪的民主形式，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渲染成似乎代表全民的“自由”“民主”国家。所以，把国体和政体区别开来，着重根据国家的阶级内容区别国家的性质，这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用以揭露和粉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诡辩的一个重要方法。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复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形式如何，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把资产阶级的一套假民主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可以夺得政权。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胡说什么，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可耻背叛。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议会并不能真正控制政府，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资产阶级实行议会制还是取消议会制，赋予议会较大的权力还是较小的权力，完全是按照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列宁指出：“**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后台决定而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来执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在危机和矛盾尖锐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可以取消这种空谈。

资产阶级宪法上所规定的选举权也是极其虚伪的。它表面上说所有公民在选举上一律平等，但同时又用居住年限、财产状况、文化程度、民族等等条件来加以限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再加上资产阶级的贿赂、威胁等不法活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获得自己应得的议席，这样，资产阶级在议会中就可以拼凑一个绝对的多数来通过自己的议案，以“人民”的名义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所以议会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幌子而已。美国的“两党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标本的形式。美国几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无非就是大资产阶级确定由本阶级中谁出来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实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议会

选举的实质“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毛主席说：“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也日益由虚伪的民主转向公开的反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少数垄断组织和财政寡头直接控制国家机器，使垄断势力和国家权力合为一体，使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变成了垄断集团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这种反动的统治机构对内实行公开的法西斯恐怖，残酷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外推行疯狂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特别是军队、警察、特务组织等反革命暴力机关发展到空前庞大的地步。现代修正主义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垄断集团日益直接控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改变，把财政寡头榨取最大利润的工具，说成是“监督”、“限制”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并胡说只要工人阶级对它“不断施加压力”，就可以将国家机器变为“社会公仆”。这是用谎言来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散布这种谎言的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放弃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国家政权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崭新的国家类型。它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多数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这种专政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专政。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采取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执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预见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国家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刘少奇一类骗子和其他党内资产阶级分子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鼓吹所谓：“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反动谬论，对此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如前所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个机器是由包括军队、警察、法院、政府等成分构成的。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因此，国家政权不仅仅是一个“领导班子”。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压迫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工具。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胡说什么“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不讲那个阶级的领导班子，也不讲政权的属性，这就抹煞了政权的本质，否定了政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朕即国家”的翻版，即他就是政权。

既然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那么，任何领导班子都只能是某一个阶级的成员，某一个阶级的代表；而且，这个领导班子能否真正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为本阶级掌好权，最根本的还要看它是否服从本阶级政党的领导，执行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决定政权的性质，决定政权的得失。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各级领导班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才能发挥作用，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正确路线，各级领导就不能发挥作用，就可能变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只讲“政权就是领导班子”，不讲党的领导，不讲路线正确与否，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我们不去跟党、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去迷信他们那个“领导班子”的权力，服从他们的指挥，以达到他们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领导班子就是政权”，也是对人民群众的反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人民群众是我们政权的基础。领导班子只能是群众的代表，领导班子的权力是群众的权力的体现，本质上还是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如果不代表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领导班子”就会变成“光杆司令”，所谓政权，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只讲“领导班子”，不讲群众的作用，其目的就是妄图反对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就是要抽掉我们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改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同样，既然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任何国家政权都有保护本阶级和镇压敌对阶级两个方面的作用。是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就必然要用以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就必然用以保护资产阶级，并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同样具有保护和镇压两个方面的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用政权来保护自己，用政权来压迫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一小撮反动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只讲“政权是镇压之权”，而不讲政权的阶级性质，不讲那个阶级镇压那个阶级，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作用，就是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大肆鼓吹“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反动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仇视人民群众的法西斯咀脸。

三 社会形态的更替必须经过社会革命

在阶级社会里，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因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革命。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种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由此可见，革命是由社会内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其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还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的时候，任何人想要“提倡革命”、“制造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当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变成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时，任何人想“禁止革命”、“消灭革命”也是不可能的。不管反动派如何防范、镇压，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将必然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革命“输出”或“输入”的论调，都是帝国主义的胡说。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不可分割的，当生产力发展到要求突破现存的旧生产关系时，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决不会自行改变这一生产关系，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他们除了在经济上继续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外，还要运用反动的上层建筑的力量，首先是反动的国家机器，来竭力维护旧的生产关系。被压迫阶级只有起来进行革命，用暴力推翻反动的国家政权，才能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社会向前发展。所以，“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乃是实现革命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而要夺取政权必须经过暴力革命。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都是如此。

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革命的一般进程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创立和传播先进思想，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在革命中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力飞跃地向前发展，推动社会形态走向新的更高的阶段。

社会基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引起革命。革命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时，才能够发生和取得胜利。

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指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明确规定，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要使革命得到顺利的发展并取得胜利，除了有革命的客观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即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主观条件成熟的程度，集中地表现为有无成熟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政党的领导。

社会总是在和平发展与革命变革的交互更替中前进的。和平发展时期总是比革命变革时期长得多，但革命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强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革命高涨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热情和理想。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历史上一切革命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发挥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起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摧毁腐朽的旧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实现飞跃的进步。

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是根本不同的。革命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一种旧的社会制度，意味着社会的质变和飞跃；改良则是在保存旧制度的前提下的某些微小的、量的变化。革命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政变以及同一阶级中掌握政权的个别人物和集团的更换，也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种变更并没有改变政权的阶级本质。至于反动阶级重新夺得了政权，暂时恢复了它的统治，那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反革命了。总之，只有消灭旧的社会制度代之以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变革，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出发，故意抹杀革命和政变的区别，否认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把统治阶级的“宫廷政变”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一部阶级斗争史、人民革命史描写成少数几个人政变来政变去的政变史。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对人民群众的诬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上有过各种形式的政变。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生的政变，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些可能带有改良的性质，有些则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他打的是什么旗号，都不会摧毁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只不过是使这个机器更换一下主人。至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津津乐道的“宫廷政变”，只不过是同一反动统治阶级上层狗咬狗的斗争，是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为了实行权力再分配而进行的争夺。无论他们怎样互相残杀，改朝换代，并不会改变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镇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如果得逞，可能出现历史的倒退，但这只是暂时的

现象，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也不是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政变，而是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革命。社会基本矛盾是革命的一般根据，不同性质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革命的特殊根据。毛主席在论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尊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谓革命的类型就是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等的总和，而这些都是由不同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基础上，产生过不同类型的革命：这就是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革命，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下面我们来着重分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民主主义革命

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17—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先后都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统治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带着自己反封建的要求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因而使这种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当时革命的动力，包括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还处在比较幼稚的阶段，没有完全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手工业者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确立了统治地位。

（二）195年至19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阶段，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俄国资产阶级则由于害怕彻底的人民革命，而趋向于同封建势力相妥协，甚至直接投入反革命的营垒。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世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那种积极作用，不能充当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时代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使得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不同的特点。列宁在指导195年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这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关心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有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而资产阶级则不愿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甚至与封建势力结成联盟，来共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充分论证了这一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革命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最后是以十月武装起义完成了这一转变。

（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先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略和掠夺的目的，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解放前的旧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发展，就必然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结束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进一步指出：在由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它使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威胁帝国主义生命的前线，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制度，而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所支持。因此，从革命阵线上说来，这种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正因为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支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在实际

上帮助了帝国主义，就会损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千万‘殖民地’奴隶最紧密地全部团结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同样，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那就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同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也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的斗争如果没有国际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中国革命虽然具有许多具体的历史特点，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胜利的革命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获得了新的性质，毛主席把它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它并不要求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所以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因而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领导者。毛主席根据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组成了以工农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官、封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长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顺利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革命领导权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某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虽然也领导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运动，取得了某些胜利，但是最后仍不能彻底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这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决定的。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采取整风运动的方法，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水平，改造党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强调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和执行一条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正确路线。同时，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对于极少数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于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则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样就解决了如何把党组织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问题。

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广大的贫农和中农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领导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毛主席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正确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并反复教育全党：统一战线“**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毛主席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正确方针，在对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敌人孤立到最小的程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时，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等各种斗争形式，但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敌人的势力特别强大，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对人民实行极其野蛮的统治，对人民的革命运动采取残酷的武装镇压。因此，斗争的主要形式必然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着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建立一支由共

产党领导的、善于同敌人作战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说：“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又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在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主席把这三方面概括成“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道路。毛主席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国家的特点，提出了在中国武装夺取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而只能走先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首先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摧毁了反动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打碎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忽而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忽而又鼓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具体情况都要千遍一律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早在1933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就被蒋介石的屠刀所吓倒，怀疑武装斗争，散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提出所谓“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用“流动游击”代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路线。毛主席当即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瓦解革命的机会主义滥调。但是这个骗子为了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以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竟然恬不知耻地自吹什么“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妄图反攻倒算，要翻历史的案。真是反动透顶。为了掩盖自己反革命的面目，他们又歪曲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鼓吹什么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这种观点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早在1938年，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如何执行，又必须结合本国特点。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的这个论述，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例如，日本的革命，就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必须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毛主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该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强加于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歪曲毛主席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其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破坏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帝、修、反效劳。

总之，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三件主要武器，三件主要法宝。而这一切又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的国家。毛主席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当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着帝国主义。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毁灭性的打击。”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作是对自己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作是本国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苏修叛徒集团竭力压制、破坏这些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妄图扑灭革命的烈火，充分暴露了他们叛徒、工贼的可耻面目。但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人民革命运动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十几年来，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的无比正确和巨大威力。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着下列不同的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和成熟的时候开始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情形下开始发生的。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夺取政权，并使这个政权适合于已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却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夺取政权来完成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却只是革命的开始，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这个政权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四，资产阶级革命只限于以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去掌握政权，所以它无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革命却要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不能把广大劳动群众长久地团结在资产阶级的周围；而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能够同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结成长期的巩固的联盟。

总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它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领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矛盾发展的直接产物。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历史证明了列宁的科学预见。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第一次取得了这个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的条件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或至少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资产阶级容易采取联合行动把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革命镇压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特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原理。

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证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显著了。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某些原来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跳跃的速度赶上和超过某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国家，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起来，这些矛盾的发展削弱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使得这些体系的某些地方可以出现特别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这里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就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原理，对于战胜各种机会主义，保证十月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武装了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头脑，已经并将继续指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进军。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样才能够遵循这条道路取得自己的胜利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认为，必须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这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是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学移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又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暴力革命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由于剥削阶级的本性，资产阶级绝不会自愿让出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它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镇压革命，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的暴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取得胜利的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如前所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只要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拿过来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自己服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都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和保护私有制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则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少数

剥削者的统治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用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的分水岭。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借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说什么现在“国际舞台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头目邓小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鼓吹“中国要的是稳定团结，不是大乱，不要再搞那一套‘斗争哲学’了。”、“国家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完全是反马列毛主义的反动谬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历史的事实也驳斥了“和平过渡”的谬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在不断加强暴力机器，美、英等国的常备军成倍以至十几倍的增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对外到处进行反革命的武装干涉。这些事实证明，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永远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须进一步加强武装斗争的准备，以便随时回击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上革命的胜利。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纯粹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为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而散布的一种幻想。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能用议会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用“合法斗争”来代替“非法”斗争，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决心用人民革命战争彻底摧毁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法西斯统治的时候，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跳了出来，鼓吹“议会道路”，提出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纲领，扬言要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形式”，并“经过人民的投票表决”，“转变到社会主义”。这充分暴露了刘少奇一伙也是典型的议会谜，与赫鲁晓夫是一路货色，都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他们妄图倒转历史车轮，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蒋介石，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的统治出力卖命。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布了所谓“议会道路”的彻底破产，再次证明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是要靠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路线正确与否，决定革命的成败，决定政权的得失。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出现过太大的革命形势。但是由于第二国际多数政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党，推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因而根本谈不上引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在俄国，由于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坚持暴力革命，坚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而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有些国家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并且掌握了武装（如法国、意大利），但是由于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迷信“议会道路”，结果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尼泊尔为例，在尼泊尔，曾经有一支以毛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力量，即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领导了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建立了广大农村根据地，动摇了反动王国的统治根基。然而，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键时刻，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放弃了武装斗争和群众路线，转而幻想“和平过渡”、“议会道路”，主张在资产阶级宪政体制下争取社会主义。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背离了马列毛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本原则。其结果，不仅革命成果被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瓦解，而且党本身迅速蜕化，群众深感失望，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在中国，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有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克服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从而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从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出发，离开路线讲政权，离开路线讲“夺权”，其目的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离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如前所述，夺取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毛主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去进一步改造旧的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进一步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彻底消灭三大差别，彻底消灭阶级，为进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革命导师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大课题，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下一讲中作专门、的论述。

第九讲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至185年的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时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已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联系起来，开始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继续进行革命的思想。

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列宁总是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一切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决不能停止战斗。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的斗争中，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亲自一发动和领导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

一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上一讲里，我们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现在我们要来说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 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 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 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毛主席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并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些思想，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主席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又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

这首先是因为，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还是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还有力量，并且在某些方面还相当强大。他们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必然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反抗。在政治方面，他们作为对抗无产阶级的力量长期存在着，时时刻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钻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部门，抗拒和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经济方面，他们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在思想和文化教育方面，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其次，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为彻底改造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国家所有制的时候，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还会发生农民的两极分化。

同时，由于上述资产阶级的活动和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腐蚀作用，由于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由于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和党政机关中还会不断产生蜕化变质分子，在国营企业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在文化教育部门和知识界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

此外，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总是寻找机会，企图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和侵略。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而国内的阶级斗争，又总是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相呼应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长时期的，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复杂的，曲折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交错在一起，而且表现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常常交织在一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往往混在群众中，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或者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这就大大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更为复杂的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形成党内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内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都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化为修正主义的党。新旧资产阶级分子，新旧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就是他们所寻找的代理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大搏斗。阶级斗争不息，路线斗争不止。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曲折性的主要表现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像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候比较缓和，有时候十分激烈。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历史阶级斗争的规律

总之，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这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斗争，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是走向共产主义，还是复辟为资本主义。正确处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毛主席在领导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不断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敌人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总是非跳出来不可。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说：“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的。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决不甘心的；他们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因此，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表演一番，尽管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沉重打击，接连不断地遭到可耻的失败，还是要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阶级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建国初期，当社会主义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的时候，不法资本家大搞“五毒”，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国营经济，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抛出三十万言的反革命“意见书”，妄图进行“挖心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趁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纷纷出笼，阴谋搞垮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由他们取而代之。如此等等。这些阶级敌人都是自己跳出来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如此，这些人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由于他们的反动世界观根深蒂固，决定着他们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总是要与党与人民为敌的。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无一不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跳出来表演，还有国际方面的原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从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而

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总要到他们那里找靠山。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党阴谋活动是有国际背景的。只有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正确地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

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在时间上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每隔那么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斗争。因为任何事物矛盾的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在矛盾发展的每个具体阶段，总是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地静止和显著地变动状态，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达到矛盾的解决，从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具体阶段。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就像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这种情况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每次大的斗争之后，失败了的阶级敌人从进攻转入退却。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但是，他们要紧接着再来一次大的反扑，也办不到。这是因为，在每次大的斗争中，阶级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们要重整旗鼓，再同无产阶级进行一次大的较量，没有几年时间是不行的。我们说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斗争，不是说平时就太平无事，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大觉了。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并不是时有时无。因为事物矛盾运动不论处于那一种状态，矛盾斗争总是绝对存在着的。每次大的斗争，正是平时斗争的继续和发展，这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对阶级斗争及其规律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取得斗争的主动权。

社会主义时期牛鬼蛇神不断跳出来捣乱，无产阶级不断地扫除他们，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也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乱和治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乱就谈不上治，在一定条件下，乱必然转化为治。阶级敌人总是要搞阴谋破坏，妄图把天下搞得大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则要粉碎敌人的阴谋，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阶级敌人跳出来捣乱是坏事，但是他们一经跳出来，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嘴脸，使阶级阵线更加分明，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更好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动手歼灭这些丑类。从这个意义上讲，坏事又能变为好事。所以，天下大乱并没有什么可怕，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干部和群众。牛鬼蛇神跳出来捣乱一次，被革命人民打垮一次。剥削阶级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力量就被削弱一次，无产阶级专政就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多次的较量，反动阶级的势力一步一步被削弱，无产阶级就能最后完成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当然，每一次乱和治，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也不是机械的循环，而是都有其新的内容。每经过一次斗争，都使人们的认识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社会主义事业则胜利前进一步。乱转化为治是有条件的。乱能否转化为治，关键在于要有一条正确路线，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这个条件，就能使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明确方向，分清敌我，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的打击阶级敌人，化乱为治，夺取胜利。

牛鬼蛇神非跳出来不可；每隔几年有一次大的斗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的具体表现，这个斗争的发展总趋势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无产阶级终究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究要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胡说什么只要夺取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就一下子可以打倒”；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牛鬼蛇神基本上一网打尽”；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等等，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其目的是妄图麻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掩盖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要一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则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曾经强调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小干阉擎孽厚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分析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还有强大的力量和条件进行反抗和复辟活动，说明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毛主席十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早在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毛主席就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又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又反复指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保证。

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彻底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阶级和进入共产主义的过渡**”。列宁也说过：“**我们当然需要国家，需要一个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组织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经济。**”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对内，就是要保护人民，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消除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对外，就是要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支援世界革命，彻底埋葬帝、修、反，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苏修叛徒集团和中修叛徒集团，竭力否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苏修胡说什么苏联已经消灭了敌对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苏联“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也极力鼓吹“不能再搞那一套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了”。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仅旧的剥削阶级分子没有消灭，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出现了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今日之苏联、中国，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苏修叛徒集团甚至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野蛮的镇压。这哪里是什么“全民国家”？而是十足的法西斯专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猿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中修叛徒集团自以为高明，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人民当家作主”，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欺骗人民群众，维持其反动统治。但是欺骗是不能长久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中国人民，绝不会长期容忍中修叛徒集团骑在自己头上，我们必将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打倒新压迫者，重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能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不与任何人分享**”的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与剥削阶级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无产阶级必须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结成巩固的阶级联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可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反动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

第一，这条基本路线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第二，这条基本路线指出了解决上述矛盾的任务、步骤和方法。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经历若干阶段，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许多不同的具体工作要做。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即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第三，这条基本路线规定了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总政策。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

第四，这条基本路线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队的作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必须把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要发挥自己的先锋队作用，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总之，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妄图通过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达到他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一定要抓住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入进行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使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二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革命导师毛主席坚持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毛主席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一个伟大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首要问题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认识我们面前的两类矛盾，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切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

怎样才能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毛主席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和敌人是两个历史范畴，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是由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决定的。拿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现阶段，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是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因此，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

在现阶段，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是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是决心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是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即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被

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难于分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阶级敌人往往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掩盖起来，混进革命队伍，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兴风作浪，制造混乱。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毛主席说：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排除各种干扰，才能逐步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用专政和民主的方法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毛主席说：“**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和人民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职能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联系起来，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重大发展。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强迫他们从事劳动，都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总之，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用强迫的方法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主席说：“**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

由谁来行使这个专政呢？就是由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我们对敌人专政，主要是实行群众专政，即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而不是单纯依靠专政机关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专政。除少数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交群众监督改造。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他们的改造，有利于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有利于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骂我们的专政是“独裁”，是“专制制度”。这只不过是早已被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驳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谬论而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认为，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任何政权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或者叫独裁。一切形式的阶级专政，只有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之分，根本不存在实行独裁和不独裁之别。“**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相反，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拼命抹杀革命专政和反革命专政的区别，竭力用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谎言来欺骗人民。这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走的是同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穷途末路，手中没有半点真理，只能靠谣言和诡辩来混日子。然而谎言并不能挽救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光明正大地宣布自己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无产阶级从来不怕敌人攻击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毛主席在批驳国内外反动派攻击我们“独裁”时指出：“**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敌人越是起劲地攻击我们，正好从反面证明我们的专政做得对，同敌人划清了界限，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就越要坚持对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被革命人民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起来压迫人民。不断粉碎这种阴谋，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来，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不能用专政的方法。“**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点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毛主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

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时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主席还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另一方面，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 and 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毛主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就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中国七亿人口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私利出发。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要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必须通过批评和斗争。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问题，解决这方面的矛盾固然需要斗争，因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才能达到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就是人民内部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等属于认识方面的问题，也需要通过批评和斗争，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因为只有通过批评和斗争，才能分清是非，提高认识，找出差距，使正确的、先进的一方克服错误的、落后的一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胡说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和稀泥”，这完全是反马列毛主义、反辩证法的，是彻头彻尾的矛盾调和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只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别，没有什么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区别，任何矛盾都只有通过斗争，通过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战胜一方才能解决；只是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毛主席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运用于党内斗争，指出对党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应当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方针，指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毛主席这个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既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矛盾、不分是非的“党内和平论”，又区别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论。

总之，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就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期间，向我们发出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夺取更大的胜利。

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个民主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在人民内部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主席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是对立的统一。首先，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才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因此，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集中，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就不能搞好工作，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毛主席说：“**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又说：“**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因此，必须把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片面地强调民主和自由，否认集中和纪律，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片面强调集中和纪律，否认民主和自由，会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两种倾向都是形而上学的，都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正确地进行集中，正确地发扬民主，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社会主义的集中和民主，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广大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体现了“**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要求。这种集中和民主，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和其它一切矛盾一样，都是现实的、具

体的，只有紧密结合现实斗争和群众的实践，对它们作具体的了解和分析，才能懂得它们是怎样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知道什么应当集中，什么应当民主，弄清楚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用主观臆断代替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用少数人或某个小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代替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就不可能具体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矛盾。所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是正确地进行集中，正确地发扬民主的可靠保证。

总之，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一种良好的政治局面，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竭力攻击和破坏我们的民主集中制，鼓吹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他们恶毒攻击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并用所谓“真正的民主”的口号来欺骗人民群众。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和自由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列宁说：“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性的民主。”毛主席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民主、自由都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鼓吹的所谓“真正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民主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是骗人的鬼话。搞“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的不是我们，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又宣扬奴隶主义，要人们效忠于他们父子，效忠于他们一家，甚至狂热鼓吹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在他们所盘踞的一些地区和部门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这种倒行逆施，是违背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是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保证。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都是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总政策制定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前面我们说过，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例如，在人民内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腐蚀而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表现。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关键在于条件。毛主席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我们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转化。

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具，在三条战线上即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完成彻底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必须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对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就在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无产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权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把各种私有制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没收垄断资本的企业，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根据资产阶级对待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排挤、没收的方式，或者“赎买”的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并用，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根据自愿原则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全部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在进行“三反”、“五反”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以后，毛主席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和我们的实践，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步骤。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历了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等一系列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到公私合营，给予估产定息，实行赎买的政策。对个体手工业也经过合作化的道路，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并不意味着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觉悟的基础上逐步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提高到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水平。

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中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赫鲁晓夫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着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造就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是占统治地位的。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有相当的力量，一些文化部门的领导权并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仍然被资产阶级长期控制着。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和巩固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个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工作，防止像赫鲁晓夫、华国锋那样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认识不足，忽视这种斗争，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毛主席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因此，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为武器，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这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根本问题。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行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多次批判。1957年又领导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大搏斗。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敌我，分清了是非，孤立了资产阶级右派，驳斥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的修正主义谬论，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促进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1962年，毛主席针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总结了社会主义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中全会以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还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中国共产党向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使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登上了文艺舞台。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党的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还领导全党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公开地、系统的批判，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极其深刻、极其生动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教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革命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其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社会主义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宝库。

首先是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问题。毛主席总结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披着马列毛主义的外衣，容易迷惑群众，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一部分权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地、富、反、坏、右是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代表着帝、修、反和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为了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千方百计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胡说什么“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妄图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指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达到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风雨，得到了锻炼，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则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毛主席不但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问题，而且解决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问题。这就是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毛主席在1962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这种形式。实践证明，要揭露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野心家、阴谋家，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单纯采取组织措施，罢几个人的官是不行的。罢官的方法用过多次，但不能解决问题。这次革命不单是为了罢几个人的官，而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不但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我们不少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手里。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才能把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才能使亿万群众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受到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取得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来的经验^⑥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怕得要死，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破坏和捣乱。当着广大革命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法，向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的时候，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则煽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但是他们玩弄的种种伎俩，及时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所揭露和批判，他们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奔腾向前。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及时总结了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经验，发现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生的政权组织形式。毛主席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的发展。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要“**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斗、批、改的任务，毛主席作了明确的规定。他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指示，推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

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同时，“**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简机构，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社会主义的。毛主席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但是人民解放军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控制下，却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工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国防建设，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党内资产阶级控制军队，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让人民解放军真正为巩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服务。

在上层建筑中，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马列毛主义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1968年7月27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那些长期被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效措施。

为了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要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根本纲领，也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只有坚持用马列毛主义不断地斗私批修，才能逐步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正像毛主席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着十月革命的故乡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还灵不灵？十月革命还灵不灵？无产阶级专政还灵不灵？一时似乎成了问题，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想，既然苏联可以“和平演变”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推翻？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帝、修、反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开辟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极力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所谓世界历史上“四次文化革命”的谬论，把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文化运动、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同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说前者与后者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故意抹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剥削阶级思想文化运动的本质区别，以“歌颂”为名，行攻讦之实。他们还用恶毒的语言，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否定工农兵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努力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妄图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使人迷失方向，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退。这些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进一步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个基本原则，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准确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四 阶级的消亡和国家的灭亡

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毛主席指出：“**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阶级的消灭

如前所述，阶级是在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

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阶级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就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出现了使阶级消灭终于不可避免的物质前提了。恩格斯说：“**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可能性，创造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和消灭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正如过去阶级的产生曾经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一样，阶级的消灭也终于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

阶级的产生是自发的过程，而阶级的消灭却是人们自觉地进行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的必然途径。

列宁指出：“**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又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私人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些思想，指出要消灭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不仅要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改造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三大差别；而且要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彻底改变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这样才能彻底消灭阶级。而

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国家的消亡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国家也随之失去作用。国家的消亡和阶级的消灭一样，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家的“消亡”，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为了永远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而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由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然“自行消亡”至于资产阶级国家，则根本谈不上“自行消亡”的问题，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彻底摧毁。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在国家消亡的时候，政党也因为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消亡。毛主席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滌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由于阶级的消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国家也只能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消亡。在这个消灭阶级的长期的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和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器，才能有效地镇压国内反动派的反抗，粉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并创造必要的条件，逐步完成消灭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为了在将来完全消灭阶级和使国家归于消亡，目前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胡说什么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国家已经是“全民国家”。当代的中国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也鼓吹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部光辉著作中指出：“‘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消灭。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大同。”

这就是在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问题上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

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阶级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而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更成熟、更发展了的高阶级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阶级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问题。毛主席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只有当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的职能已经自行消亡了，在这种时候，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而努力奋斗。

综上所述，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

1 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发展。

2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还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因此，在整个社会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4 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集中地表现为党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刘少奇、华国锋、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那样的野心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向混进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粉碎修正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要斗私，批修”。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6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反潮流精神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传统习惯势力和修正主义思想仍广泛存在，社会上的错误倾向和反动思潮在相当时期内具有广泛影响。这些“潮流”往往披着“群众需要”、“现实合理”的外衣，实质上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准备。面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揭露错误，坚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方向，敢于同一切错误潮流作斗争，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潮流战士。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只有坚定不移地反潮流，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完全是造谣和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是：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否认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胡说什么农民是“落后的一帮”，像俄国这样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会与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这个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这种谬论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列宁主义路线。所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反动谬论。它同主张经过一切必要的革命阶段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妄图把两者混同起来，借以欺骗群众，达到其反革命的罪恶目的，完全是枉费心机。

第十讲 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意识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更是表现得极为剧烈和复杂。因此，正确认识社会意识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弄通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自觉地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在第六讲中我们已经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指的是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存在指的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包含地理环境和人口，但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任何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都由两个方面组成，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对于这些关系的认识，就产生和形成了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反映，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幻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看来是十分荒诞离奇的意识，也同样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在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有着它产生的现实根源。

人类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人们生活在怎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他们就会具有怎样的社会意识；这种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他们的社会意识也就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意识是不同的；就是同一个社会形态，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意识也是不同的。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从来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社会意识。例如，私有观念就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万古长存的。在原始社会的条件下，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进行劳动和平均分配产品，反映到社会

意识上就产生了原始的、素朴的集体主义观念。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私有观念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只是到了原始公社崩溃和私有制产生以后，才有私有观念的出现。而且同样是私有观念，由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也带有不同的特点。封建阶级的私有观念是和世袭的等级特权相联系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观念是和自由竞争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私有观念最后必将归于消灭。

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有着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意识。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其意识形态也必然是互相对立的。例如社会主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是“天下之通义”，而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盗跖却认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罪大极重”的，只有“耕而食，织而衣”才是“至德之隆”。这正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抽象的、超阶级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内部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由于世界各个民族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意识在许多方面还带有民族的特点。特别是文艺这样的意识形态，由于它用具体形象的方式直接反映各个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此它的民族特点就最为显著。帝国主义者为了从精神上奴役殖民地人民，采取各种野蛮手段消灭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文化。因此，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展民族的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并且对丰富世界各国的民族的民族文化作出贡献。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社会意识是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社会存在的消极的反映。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意识一旦产生之后，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发生巨大的影响。

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反过来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情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肤浅的、根本不理解事情本身的经济唯物主义的观点。**”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样不但是反唯物论，恰恰是克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毛主席还指出：“**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训诫，革命理论的创立在推动群众觉醒中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毛主席从彻底的唯物论和彻底的辩证法出发，全面地、充分地阐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抱有预期目的的自觉活动，需要有理论的指导。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反过来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指导的作用。代表先进阶级、先进势力的社会意识，由于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成型的革命任务，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要求，因此对人们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有着巨大的动员、鼓舞、教育、团结、指导的作用。这种先进的社会意识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引起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例证。和先进的社会意识相反，反动的社会意识是已经过时的腐朽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反动阶级要求的反映，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背道而驰，竭力歪曲和掩盖社会生活的真相，用种种谎言和迷信把旧制度、旧思想说成是永恒合理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对社会的变革，要人民群众永远安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反动的社会意识和传统的习惯势力结合在一起，愚弄和欺骗群众，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在人民革命的过程中，每当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反动的社会意识就活跃起来，表现为猖獗一时的状态。俄国195年革命和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任何反动的社会意识都挽救不了旧社会的灭亡。先进的社会意识由于它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必然会在斗争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掌握越来越多的群众，把旧社会推翻。反动的社会意识由于它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一天天暴露出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为人民群众所抛弃，最后归于灭亡。

凡属代表先进阶级、先进势力的社会意识都起着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但其作用有大小不同。这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先进的社会意识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因而曾经起过动员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的进步作用。但由于资产阶级受着它的狭隘的阶级眼界的限制，不可能从根本上全面地、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反映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要求，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始终局限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一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了满足，它的意识形态就开始走向反动。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全面地和彻底科学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把社会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精神武器，也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强大的推动作用过去任何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不可能比拟的。只有马克

思主义才第一次做到了自觉地用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打开了从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持久深入地动员群众，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形成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过去所不能设想的一切奇迹。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求得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但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近代中国革命史上那种在黑暗中徘徊、找不到出路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中国革命的发展空前地加速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多次严重斗争，都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每一次胜利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充分地表现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强大威力。经过文化大革命，及时地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及其一类骗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较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从1921年以后半个世纪中，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胜利。即使中国发生了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到现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真理性是永远存在的，不是任何资产阶级辩护士能够驳倒的。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否认这种反作用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变成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根本不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宣称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社会主义，否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否定革命理论的伟大指导作用，拜倒在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面前。第二国际的一些修正主义者和俄国革命初期的“经济派”就是这种理论的鼓吹者。这是一种完全反动的理论，其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

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相反，唯心主义竭力夸大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得出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荒谬结论。从表面上看，唯心主义者似乎是最重视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的了，实际上由于唯心主义者否定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否定了社会存在不以人们的社会意识为转移，只有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才能加以改变；这样，他们就否定了社会意识的真正的能动作用，即对人们的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唯心主义者所说的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即对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完全是虚假的东西，是仅仅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幻想。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竭力宣扬和散布这种幻想，企图阻止人民群众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会儿说什么任何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宣扬自发论，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一会儿又在“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的招牌下，说什么“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公然用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而其本质仍然是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但这种高度的重视决不是因为先进的思想能够，“代替”物质的力量，而是因为先进的思想能够指导革命的实践，因为先进的思想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例如，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它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庞大的国家机器），这种物质力量决不是任何思想力量所能“代替”和“超过”的，只有物质的力量才能把它打倒；但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也就会变成打倒资产阶级统治的物质力量。先进思想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宣称思想能够起“代替”和“超过”物质力量的作用，表面看来对思想的作用是再也重视不过的了，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极端仇视，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对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所起的伟大作用。解放以来，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光辉成就。这些成就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一经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多么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多么惊人的奇迹。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对于这些光辉的成就，却疯狂地加以诬蔑和攻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一团漆黑，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暴露出他们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丑恶嘴脸。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的否定，也就是对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伟大作用的否定。他们真正“重视”的思想，绝不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法西斯的思想。他们所谓的“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就是妄图按照反动的唯心史观来改造世界，“发挥”地主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思想力量来“代替”和“超过”人民的革命力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嚎叫法西斯头子蒋介石所谓的“不成功，便成仁”，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为了要从他们的法西斯前妻那里汲取“思想的力量”。但是，这既没有使他们“成功”，也没有使他们“成仁”，而是成了永远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突出地表现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除此之外，这种相对的独立性还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发展上。正确地理解这种相对独立性，对于正确认识社会意识发展的规律性，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和各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社会意识，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都随着自己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但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并不是彼此隔绝、毫不相干的。每一个新的时代的社会意识虽然和旧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它并不是在一片空地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利用旧时代的社会意识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旧时代的社会意识虽然随着旧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消灭而消灭了，但它所取得的思想资料和成果并没有被简单地抛弃，而是成了新时代的社会意识进一步发展的起点。社会意识发展的这种历史的继承性，表现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对于社会存在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新时代对于旧时代的社会意识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要加以改造和发展，吸收什么东西、抛弃什么东西和增加什么东西，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存在，即决定于一定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唯心主义夸大社会意识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把社会意识的发展说成是一个绝对效立于社会存在并决定着社会存在的纯粹思维过程这短完全错误和反动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从过去的思想文化遗产中继承什么东西，决定于各个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总是继承那些还有积极意义的进步的东西，反动的阶级则先承那些完全腐朽反动的东西。例如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就从古代希腊罗马的思想文化遗产中继承了某些在当时还多少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料和成果。而当资产阶级走向反动之后，它就抛弃了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中一切有进步意义的东西，转而继承那些完全腐朽反动的东西。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古代和中世纪各种极端反动的神秘主义的复活和流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并不是脱离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对人类全部思想文化遗产进行了彻底科学的批判，吸取和改造了各种有价值的成果，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锻造出了一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使人类思想史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

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机械论者，否认社会意识的发展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割断历史，因而得出了全盘否定过去一切思想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结论。苏联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列宁严厉地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正确原则。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反对虚无主义的观点，主张继承人类思想文化遗产，但马克思主义所要继承的只是遗产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对于这些东西，还必须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加以批判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继承是批判的继承，目的是为了创造无产阶级自己全新的革命的思想文化，而不是为了颂扬和复活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列宁说：“……**保存遗产，并不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故纸堆那样。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

毛主席在谈到如何对待社会主义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时，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制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一姓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也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奇景。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一会儿会颂古非今，拜倒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化的面前，活现出一副剥削阶级的遗老遗少的丑态；一会儿又割断历史，一笔抹煞人类过去的思想文化遗产，甚至公开叫嚷历史“可以不要”。这都不过是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势下所采取的不同的反革命手法。归根到底，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保存和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文化，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理论纲领、政治纲领和反革命的政变纲领，就是用古今中外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拼凑起来的。他们的反动头子并不是不讲历史，只是不讲人民群众的历史，不讲阶级斗争史，而津津乐道历代野心家、阴谋家的丑史秽闻。所有这些，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的实质。在对待思想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的流毒，既要反对虚无主义，又要反对一切形式的颂古非今和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毒素，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正确方针，为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而奋斗。

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关系

社会意识的发展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所决定的，但社会意识的发展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正比。拿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十九世纪末叶经济落后的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所有这些情况，也是社会意识的发展对于社会存在的独立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独立性，和社会意识在其他方面所表现的独立性一样，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先进的社会意识，归根到底仍然是为经济的原因所决定的。这些国家的经济虽然落后，但它已经产生了和先进国家中的革命阶级性质相同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和反动阶级的矛盾，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变得比先进的国家更加尖锐和深刻，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成了当时革命的中心，提出了先进的思想。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和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是这样，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和西欧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这样。无论任何时候，先进思想的产生都是以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和革命阶级的产生为前提的。如果在德国和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没有相当成长了的无产阶级，那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其次，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能产生出先进的社会意识，是因为它利用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所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例如，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哲学利用了十七世纪以来的英国哲学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如果没有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这种成果，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出比先进国家更进步的社会意识来的。

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我们在研究各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的时候，必需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而不能用一个抽象的公式去到处乱套。马克思指出：“**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是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罍，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跑特征以及这种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一些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上把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的人，直接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去说明意识形态的发展，其结果就得出了一系列荒谬的结论。拿艺术来说，按照这种说法，资本主义社会使生产力达到了高度的发展，那’么它的艺术也应该是最繁荣、最进步的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同艺术的发展是敌对的，它并没有引起艺术的进步和繁荣，而是使艺术不断地趋于反动和没落 d 在政治方面，那种认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观点，同样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庸俗化。社会主义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叛徒王明所谓的“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论调，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

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相互作用

社会意识有各种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一个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机的整体。每一种意识形态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例如文艺的发展就在不同的方面受着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宗教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这些意识形态。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多方面的相互作用中，政治思想和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思想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起着统帅和指导的作用，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核心。

由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忽视这种相互作用，单纯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社会意识，就不可能正确解释社会意识的发展。例如，忽视欧洲中世纪宗教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这一时期各种意识形态的发展；离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的发展就无从得到正确的说明；不注意政治思想、哲学、道德思想和中国封建时代的文艺的密切联系，就解释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所具有的一些显著特点；不看到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艺术发展的作用，就不能了解革命文艺发展的规律。此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某些意识形态发展的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别的意识形态对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忽视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也不能完全正确地说明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发展的决定作用。

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受着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仅仅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来解释，这种情形也是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独立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仍然是为经济的发展所制约的。例如宗教在欧洲中世纪之所以对其他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由欧洲封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二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社会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

人类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历来就充满了各种对立的思想、情感、意见、观点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斗争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每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审美力量。”历囊二切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它的统治；总是利用它所掌握的各种宣传工具，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广泛地宣传统治阶级的思想，把它的统治说成是绝对合理和永恒不变的，企图使广大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和俯首贴耳地接受这种统治。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同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揭穿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宣传自己的进步的社会理想，把广大人民从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动员广大人民去为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而斗争。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各个阶级进行斗争的精神武器。在一个阶级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是这个阶级为争取自身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武器；在一个阶级取得统治的地位后，它是这个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武器。

相互对立的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每天都在进行着。特别是在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这种斗争表现得更加尖锐、剧烈和鲜明。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又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毛主席的话深刻地阐明了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从对旧制度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是社会革命到来的征兆和先声，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舆论准备。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进行这种批判的武器。为了推翻封建制度，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家曾经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发动了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猛烈批判，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这正是一场大喊大叫，它动摇了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宗教和神学教条的信仰，起到了动员人民的作用，成为法国“政治变革的前导”。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早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继续进行了这种批判，但它没有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非科学性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摧毁了各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反动思想体系，用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了全世界无产者，第一次把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成为一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大军，打开了人类历史崭新的一页。社会主义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场革命大批判运动，它的锋芒所向，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各种反动思想，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的事实说明，每一个革命阶级在对旧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之前，首先要进行思想的批判，没有这种批判，要实现社会的变革是不可能的

和革命的阶级完全相反，在每一次社会变革中，一切反动的阶级总是竭力要守住它们的反动的思想阵地，同革命阶级的思想进行拼死的斗争。它们在被推翻之前，不仅采取各种无耻的手法攻击革命阶级的思想，而且利用还掌握在它们手中的国家机器残酷迫害进步的思想家镇压革命人民，千方百计阻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它们在被推翻之后，仍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革命阶级思想的斗争，总是企图制造反革命舆论，实现反革命的复辟。奴隶主阶级被推翻之后是这样，封建阶级被推翻之后是这样，资产阶级被推翻之后更是这样。但是，它们的手里没有真理，因此它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和垂死挣扎，终究挽救不了反动阶级思想的彻底破产，改变不了它们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把意识形态作为斗争的武器。但是，历来的剥削阶级却竭力要掩盖这个事实，否认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否认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们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为了要把代表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是唯一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奉行的天经地义，以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从思想上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不需要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不需要掩盖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它所要打倒的敌人只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少数剥削者。马克思主义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彻底揭穿一切主张意识形态是超阶级的谎言。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清剥削阶级的欺骗宣传的反动本质，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贯穿这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斗争，归根到底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反映，基本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的根本出发点。只有时刻不忘这个出发点，才能抓住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实质，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脉搏，辨明是非，看清方向，坚定不移地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相反，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会是非不明，方向不清，受骗上当。毛主席教导我们：“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斗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斗争。经过社

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它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时刻都在梦想复辟。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复辟企图和复辟活动，又总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解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首先从政治上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思想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制造反革命的舆论，妄图动摇人心，争取群众 99 造成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局面，以达到他们最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在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及时地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揭穿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每一次胜利，都使全国人民从斗争中提高了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水平，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灵敏的晴雨表；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每一次进攻，都是他们的复辟活动的反革命信号。我们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始终抓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善于辨别风向，及时粉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进攻。如果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不以为意，掉以轻心，听任各种反动思想自由泛滥，占领市场，那末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可能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是隐藏在我们队伍内部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是一伙极为狡猾、阴险而又虚弱的敌人，同时也是革命人民的难得的反面教员。为了篡权复辟，他们继承了中外反革命头子的衣钵，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说：“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些话，看来好像是在揭露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这一套反革命伎俩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反革命政变史，资产阶级只要抓了舆论，又抓了枪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们接连地抛出了一系列反动谬论，在全国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来一个抢班夺权，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重新拖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一切反革命分子自以为他们能峻任意左右中国人民的舆论，一这不过是在做梦而已。一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里深深懂得：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九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才能救中国。解放以来，一切反革命分子妄图用“抓舆论”的办法来打开缺口，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也没有得到比他们更好的下场。中国人民在革命导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及时地戳穿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发动了对这一伙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他们的反革命舆论破产了，反革命面目暴露了，最后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受到了历史的无情惩罚。

社会主义鼠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反映到意识形态的领域，斗争也同样是长期的。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制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演解决。这是因为这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社会主义中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还要长期存、在，是由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虽然已经失去了它的生产资料，但是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存在，还有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在国外还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影响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还会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此外，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在产品的分配上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还没有完全消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所有这些原因，使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有了它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还没有被彻底消灭之前，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之前，在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会彻底消灭的，资产阶级也决不会放弃它的复辟的幻想。其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有着长期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了几百年。在这几百年内，资产阶级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充分地发展了，并且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它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这种在几百年时间内形成的习糖势力，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消灭的。毛主席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俯时代遗留下来法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届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息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长期作战。我们坚信无产阶级的意形态必定要战胜和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要时刻为此而努力奋斗。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多次反复的。看不到这种长期性，低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陶醉于一时的胜利，放松革命的斗志，都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什么“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做思想工作要“雷厉风行”等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长期性，否定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只有经过长期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其目的就是要取消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相当顽固的、还没有被消灭的资产阶级

思想说成是经过他们的一次所谓“革命”就很快地被消灭了，这样来欺骗群众，给原封未动的资产阶级思想贴上“已经革命”的标签，在“革命”的幌子之下大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突出地表现在已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通过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来和无产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资产阶级十分孤立，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反革命的策略。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聿学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运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善于透过表面的现象和词句去判明各种有关重大问题的理论、思想、意见、言论等等所包含的真实的阶级内容，判明它是哪一个阶级的要求的反映，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在分析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言论、纲领和路线的时候，不仅要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不仅要看他们在某时某地的言行，还要看他们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言行；不仅要看他们公开的言行，还要看他们隐蔽的言行。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全面的正确的判断，才不致为各种局部的个别的假象所迷惑。例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推行的本来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但他们为了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伪装起来，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又发表了一些看来很“左”的言论，采取了一些看来很“左”的做法。如果我们只孤立地看到这种个别的现象，而看不到他们在一段长时期内的整个的言行，看不到在他们公开的言行之外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脱去了一切伪装的隐蔽的言行，那就会误以为他们所推行的路线是什么极“左”，就会打不中这一伙骗子的要害，分不清真正的是非，而且会偏离斗争的大方向。其次，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还经常挑动和利用部分群众中间所存在的错误思想，借以兴风作浪，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认识这种复杂性，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群众中的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否则就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群众，有利于敌人。最后，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从政治思想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它有时候是从某些看来似乎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的抽象的理论问题上表现出来，有时是从文艺作品中曲折地表现出来，哲学上有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文艺方面反动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反动剧本《海瑞罢官》等的出笼，就是明显的例证。我们要认识这种复杂的情况，及时地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就必须掌握整个政治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的动向，具有敏锐的阶级嗅觉，决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是长期的、复杂的，而且有时还是很激烈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都必然要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最后爆发成为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只有通过这种激烈的斗争，才能深刻地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才能给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这一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场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夺回了过去为资产阶级所占有的阵地，极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焕然一新，空前强盛。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的方针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一方针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它给我们指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和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正确途径，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辩证法的观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哲学根据。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来看，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好与坏，科学上不同流派的正确与错误，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艺术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加以细心的比较和鉴别。这就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能够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能够自由讨论。对待艺术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轻率地下结论，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其结果只能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处于领导的地位，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样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对于人民内部所出现的错误思想，不能采取

禁止和压服的方法去对待。采取这种简单的方法，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省力、很痛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错误的思想虽然被压下去了，但并没有被克服和战胜；正确的思想虽然取得了胜利了，但这是一种表面的胜利。正确的思想如果不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形成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一当错误思想抬头的时候，就会抵挡不住错误思想的进攻，打不了胜仗。这种简单的禁止或压服的方法，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发展这个辩证法的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它不但不能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反而会削弱这种地位，甚至使这种地位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假象，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达到战胜人民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的目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通过这种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去发展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思想。只有采取这种方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和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加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毛主席深刻指出：“**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战胜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因此它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是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有着自己鉴别香花和毒草的明确的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和否定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用毒草冒充香花，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之下向党和社会主义实行猖狂进攻，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革命惯伎。我们在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防止他们利用这个口号去达到反革命的目的。必须深刻地认识，我们之所以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通过人民内部的辩论和说理的方法去有效地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而决不是为了其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脱离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去看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所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我们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这是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

三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反映。这些关系，包含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的形态的多样性，首先是由它所反映的内容的多样性决定的。其次，对于同一内容的反映形式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古代，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是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还没有明确地相互区分开来。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各种不同职能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部门的分工的发展，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才逐步地区分开来和独立起来。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虽然是相互区别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始终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有机整体。

我们要认识社会意识的本质，不但要认识它的各种形态共同具有的普遍本质，而且还要认识各种形态的特殊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意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具体的了解。

以下就来分述社会意识的各种不同形态。

政治思想

毛主席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政治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反映着这个阶级怎样处理它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怎样和敌对的阶级进行斗争，怎样去争取自己的统治和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含一定阶级在斗争中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以及一定阶级对阶级统治的最高形式——国家政权的起源、实质、作用等等的认识。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出互相对立的一定的阶级，同时也就产生出这些阶级的互相对立的政治思想。例如，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产生出了与封建阶级相对立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为了在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实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要求打破闭关自守的各种封建特权，推翻建立在等级特权之上的封建专制国家，这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即“天赋人权说”、“社会契约论”。这种理论和封建阶级用来维护封建专制的理论，即“君权神授说”是根本对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种理论，和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所谓自由平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总是随着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变化而变化，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超阶级的政治思想。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有时也大讲其政治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谓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彻头彻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这种反革命的政治，具体地表现在他们的法西斯式的反革命纲领之中。我们必须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出发去分析这伙骗子所谓的政治，揭穿它的反动实质，决不可为他们制造的一些假象所迷惑。

政治思想是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反映。在相互敌对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中，政治是关系到一个阶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政治在社会意识的各种形态中起着统帅的作用，是整个社会意识形

态的灵魂。一切意识形态无不从属于一定的政治和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毛主席说：“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法权思想

和政治思想一样，法权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当私有制一经形成，在人们头脑中就出现了最早的法权观念，即对于财产的私人占有权的观念。和保护私有制的国家出现的同时，法律产生了。这些法律，把剥削阶级统治下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用条文固定下来，并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迫使人们遵守，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侵犯。所谓法权思想，就是关于法律的起源、实质和作用的理论。它为一定阶级的法律提供理论根据，从理论上证明这个阶级的法律是必要的、合理的和人人应该遵循的。

法权思想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最直接的反映。统治阶级的法权思想反映着这个阶级所要维护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并且具体地体现在它所制定的法律之中。被统治阶级的法权思想反映着这个阶级变革现存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要求，从理论上对现行的统治阶级的法律进行批判。例如在社会主义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阶级的法权思想认为贫富贵贱的区分是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的，帝王所制定的法律绝对合理，“小人不出布帛菽粟以事其上则诛”（韩愈）。和封建阶级的这种法权思想完全相反，农民在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起义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的法权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相适应的法权思想，超阶级的法权思想是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

为了给剥削阶级的法律作辩护，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法权思想。这些思想尽管说法各有不同，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私有制和保护私有制的国家是完全必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法律是完全必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据这种法权思想制定的法律，是一小撮剥削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和剥削阶级的法权思想完全相反，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劳动者不得食，是无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根本前提。依据这种法权思想制定的法律，如社会主义中国政府所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惩治反革命条例》，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镇压剥削者、保卫人民利益的重要武器。

道德

道德这种意识形态的起源比法权思想的产生要早。在原始社会里，当人类从类似于畜群的生活发展到共同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并且意识到社会的集体利益的时候，道德观念就开始出现了。

人类为了进行生产，就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共同活动。没有这种关系，就没有生产，没有人类社会。因此，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受着他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的制约。当他的行为符合于他与一定社会成员所结成的一定关系，因而符合于这些成员的根本利益时，他就会受到这些成员的赞许；在相反的情况下，他就会受到这些成员的谴责。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荣誉与耻辱这些道德观念，就是从对于人们行为的这种评价之中产生出来的。所谓道德就是评价人们行为的各种规范的总和，它的作用就是要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符合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调整的作用，是通过社会的舆论，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道德与法律不同，不具有法律的那种强制作用。但是，正因为道德是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个人的信念来维持的，所以当某一种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时，它就会成为推动人们自觉行动的力量，产生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另外，也应该看到，道德的作用虽然可以发挥到最高的限度，但在阶级社会里要完全依靠道德来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律的强制作用也不可少。

道德观念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行为受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由于社会需要经常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道德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也就有什么样的道德。道德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比较直接的。

在原始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下，还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存在，因而也没有统治和奴役的存在，没有权利与义务的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自由的。这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质朴的道德观念：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遭受的损害看做是对自己的损害，无条件地服从集体的决议，不顾一切地维护氏族的利益，为氏族而英勇作战。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后来阶级社会中那种一切为自私自利的动机所支配的道德比较起来，原始社会的道德站在纯朴道德的高峰，具有极为高尚的性质。

随着原始公社的崩溃，道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分裂为互相敌对的阶级，每一个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原始社会中那种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的纯朴的道德看不到了，道德变成了阶级的道德，变成了各个敌对阶级相互进行斗争的武器。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道德；阶级关系变化了，道德也就随之变化。统一的、超阶级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是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各种“圣人”和“贤人”们宣称有这种道德的存在，其实质是要把剥削阶级的道德冒充为万古长存的、绝对合理的、全人类的道德，因而是人人必须实行的道德，这样来欺骗人民，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彻底揭穿了这种骗局，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

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期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是建立在奴隶主对一切生产资料和奴隶的占有的基础之上的，是为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服务的。在奴隶主看来，奴隶生来就应该当牛作马。奴隶主对奴隶的一切残酷的剥削压迫，从当作牲畜出卖到加以屠杀，统统都是合乎道德的。奴隶如果反抗奴隶主的统治，实行逃亡和起义，那就是大逆不道。与奴隶主的道德相反，要求解放的奴隶认为奴隶主的统治是违反道德的，而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则是完全合乎道德的。社会主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盗跖被奴隶主骂为大逆不道，可是“其徒诵义无穷”，广大奴隶和被压迫人民到处传颂盗跖的仁义。这正是奴隶与奴隶主的道德观的对立的鲜明表现。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建立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专制统治服务的。这种封建道德，在欧州中世是基督教的道德，在中国是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封建阶级的道德经常同宗教和宗族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有很大的欺骗性。封建阶级的道德一方面把封建的等级特权和专制统治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又竭力宣扬“温良恭俭让”、“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把一切触犯等级特权和反抗专制统治的行为视为大逆不道。和封建阶级的道德相反，广大农民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革命的道德观念，宣告封建阶级的统治是违反道德的，农民的革命起义是“替天行道”。在每一次农民起义中，都表现了农民阶级与封建阶级的道德观念的对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依靠商品生产和自由竞争的力量打破了封建的、宗法的关系，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封建阶级的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与此同时，它在道德上把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宣布为最高的准则。资产阶级的道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曾经在要求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名义之下，起过反对封建特权和封建专制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真正的个性解放。因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对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之上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就是资产阶级不断发财致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不断贫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要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可是，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起来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大叫这是在消灭社会生存的基础，消灭文化，消灭人的自由和个性，同时也就是消灭道德。共产主义思想一产生，资产阶级就视为洪水猛兽，百般诬蔑共产主义是道德的毁灭。这就清楚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的反动本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个性解放的虚伪性。其次，资产阶级的无止境的个人主义欲望，是要靠资本的利润和金钱来满足的。没有金钱，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就无从实现因此，金钱也就成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真正标准。如果说封建阶级认为它的道德标准是由上帝决定的，那末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就是由金钱决定的，金钱是资产阶级的真正的上帝。“我是一个恶劣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受尊敬的。货币是最高的善，这就是说，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免于作不诚实者的麻烦，——所以事前就认为我是诚实的。”马克思的这段话，以辛辣的讽刺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无耻和腐朽。目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穷奢极欲、虚伪、奸诈、诲淫、诲盗、谋杀等现象充斥整个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败坏的严重性，是资产阶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了。但是，除了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加以摧毁之外，资产阶级所开的任何药方都不可能制止道德败坏现象的不断加深和蔓延。

共产主义的道德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共产主义的道德继承了劳动人民在世世代代的劳动和斗争中所培养起来的优秀品质，继承了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传统，并且在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把它大大地发展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最崇高的道德。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完全相反，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原则是集体主义，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良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就是这样的人。雷锋同志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先进思想和事迹鲜明地体现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根本精神，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和教育下，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像雷锋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到处涌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最崇高的道德风尚的社会，充满着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革命朝气，和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败坏、腐朽没落的黑暗景象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在今天是某些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的了。

道德这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推翻了一小撮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道德的发扬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要使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始终不懈地发扬共产主义的道德，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却完全相反，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刘少奇在他的黑

《修养》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鼓吹孔孟之道，妄图把无产阶级的道德篡改成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表面上讲什么“破私立公”，实际上却疯狂反对思想改造，把广大干部坚持走“五、七”道路和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诬蔑为“变相劳改”。这是一伙道德极端腐朽堕落的伪君子，他们无比仇视无产阶级的道德，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道德。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一心要投靠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子勃列日涅夫之流，同样是一伙伪君子，他们口头上也讲什么共产主义的道德，实际上奉行的却是最下流无耻的资产阶级道德。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列宁所缔造的具有高尚道德的苏维埃社会，变成了道德败坏现象与日俱增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他们的日子是长不了的。总有一天，苏联人民必将要彻底清算这伙叛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科学

科学以概念、定义、公式、定律等逻辑的形式反映世界，是人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体系。科学由于它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区分为许多不同的部类，但基本上不外两大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来源于实践，是人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指导人们的实践，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主席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

自然科学是生产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为生产服务的，因此它的发展是为生产所决定的。自然科学的产生，它的各种研究课题的提出，每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发展的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靠把科学推向前进。**”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各种有关自然现象的实际材料，是由生产的发展所提供的。如航海和地理上的发现，就为生物学的观察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使达尔文学说的提出成为可能。自然科学实验所使用的仪器，也只有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能制造出来。在生产技术的发展还不能制造天文望远镜之前，天文学的发展就是很有限的。唯心主义者否定物质生产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完全违背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发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毛主席说：“**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规律。这些规律的产生和存在同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无关。任何一个阶级要进行生产，都必须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自然规律本身虽然和阶级斗争无关，但人们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却是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总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自然科学，是从来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的。自然科学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成为资产阶级增加利润和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相反，自然科学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科学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狭隘的私利的限制，获得广阔的发展天地。其次，自然科学家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的，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他都是在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去研究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越是往前发展，就越是暴露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大思想障碍。自然科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获得顺利的迅速的发展。最后，自然科学上的各种发现是同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同哲学的发展密切相联的，因而也是和阶级斗争密切相联的。自然科学上的各种重大发现，有力地证实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的正确性，揭穿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的世界观的虚妄，因此它成了先进阶级捍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世界观的有力武器。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发现了太阳是天体的中心的哥白尼，由于他的学说和教会的教条发生了矛盾，动摇了宗教的教义，因而遭到了教会的迫害。在他之后的意大利的科学家布鲁诺，甚至因为宣传太阳中心说而被教会活活烧死。自然科学在当时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在近代，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推翻了宗教教义而遭到反动阶级的疯狂攻击，教会的反动头子甚至明令禁止在学校中讲授进化论。在现代，资产阶级竭力歪曲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来反对唯物主义，为唯心主义和宗教制造理论根据。自然科学从来不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否认自然科学与阶级斗争的密切联系，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理论。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本身虽然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它的发生作用却是同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直接相连的，因此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就必然要以不同阶级的利益为转移。在历史上，当剥削阶级还是进步的社会力量、它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有某种程度的一致的时候，它的代表人物能够多少正确地认识个别社会现象的本质，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剥削阶级的偏见也仍然经常在歪曲社会的真相。到了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而走向反动之后，它对于社会现象就再也不可能有了正确的认识了。例如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的资产阶级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能够在个别方面或多或少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某些本质。而当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充分发展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磷，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著章还是不违背警宰J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不

同，它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它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它不需要掩盖真理。“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鯉。**”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全面和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它所负担的任务，决定了它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社会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客观主义。

哲学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和科学一样，是用概念等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但哲学的反映比科学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性。哲学是所有各种意识形态的最高的理论前提，是贯穿在各种意识形态之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各种意识形态起着指导的作用。一切意识形态都离不开哲学的影响，不是与唯物主义的哲学相联系，就是与唯心主义的哲学相联系。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对立的观点和倾向的斗争，最后必然要表现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要彻底战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就必须把它提到哲学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摧毁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在阶级社会里，哲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哲学以及宗教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哲学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联系，经常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哲学不论以何等抽象的甚至是神秘的形式表现出来，归根到底仍然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基础对哲学发展的决定作用，常常通过其他意识形态对哲学的影响而表现出来。对于哲学的发展有着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思想，其次是法权思想以及道德思想。

文艺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科学相比，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用概念的逻辑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来，而是用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但是，并非对于生活的任何形象的反映都是文艺。文艺作品中的形象，是具有生动的个性特点的形象，是体现了对生活本质的认识的形象，是表达了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思想、感情、愿望、理想的形象。只有这样的形象，才能发生文艺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才是艺术的形象。文艺对生活的形象的反映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物质表现手段，因而有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文学之分。

文艺起源于劳动。原始的音乐就是劳动的“号子”。原始的舞蹈、绘画、雕刻是生产活动的再现。一切原始艺术的内容都，直接为生产所决定。例如，只懂得狩猎的民族即使住在花草繁茂的地区，在他们的绘画里也看不到花草的形象。花草在绘画或装饰图案中的出现，是在人类学会了农业生产以后。在阶级社会里，由手脑力劳动脱离体力劳动而独立，文艺为少数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所垄断，因此文艺和物质生产的联系越来越远。但是，这种联系仍然存在。任何社会的文艺的发展归根到底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理想等等，从而决定着一定社会的文艺。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否定艺术的阶级性，大肆鼓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把艺术说成是什么“共同的人性”的表现。毛主席彻底揭穿了这种谬论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呢？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谓的表现“共同的人性”的艺术，就是表现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艺术。

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有着它的特殊作用的重要工具。文艺由于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和在群众日常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它是一种能够经常发生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先进阶级的文艺对于人民群众的斗争起着团结、教育、鼓舞的作用，推动社会的前进。例如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所写的《国际歌》，它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理想传遍了全世界，直到今天仍然在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的斗争。历史上某些剥削阶级在上升时期的文艺，也曾经起过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但它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剥削阶级的文艺即使在它还有着进步性的时候，也从来不可能正确反映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可能表达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要求。和先进阶级的文艺完全相反，一切反动阶级的文艺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起着麻痹、腐蚀、瓦解的作用，阻碍着社会的前进。目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文艺，已经堕落到了空前腐朽的程度，导致了艺术的毁灭。在技巧上极端低劣，在内容上海淫海盗的无耻下流的作品充斥整个社会。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流派（所谓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等等）朝生暮死，此起彼落。最难听的噪音成了最神奇的音乐，最露骨的色情表演成了最美妙的舞蹈，黑猩猩成了绘画的“巨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者妄图用这样的“艺术”来毒害人民，阻止人民起来革命，但这只是他们的妄想而已。

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服务的，而是为掌握着人类历史命运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妄图改变无

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他们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他们不去反映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去歌颂工农兵的伟大斗争，却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我们的舞台上耀武扬威，专无产阶级的政。他们千方百计阴谋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贯彻执行，拼死保住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阵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夺回了被他们占领的文艺阵地。在文艺领域中实现了一场空前广泛和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就是这场大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它揭开了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崭新的一页。自从无产阶级文艺产生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作品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崇高品质表现得这样真实，这样突出，这样完美，这样理想，这样具有激动人心的强大的艺术力量。革命样板戏的产生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它将对无产阶级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艺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无比生动丰富的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和生活本身比较起来，文艺作品对于生活的反映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和近似的，不可能把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无比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全再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的劳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⁶正因为这样，文艺作品能够提高人民群众对于生活的本质的认识，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感情，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推动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在文艺创作中，我们既要坚持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反对一切唯心主义论调；又要坚持文艺可以而且应该高于生活，反对一切机械唯物主义的论调。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所需要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发挥文艺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哲学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在文艺创作上则鼓吹反动的“灵感论”。他把“灵感”说成是一种“稍纵即逝”、神秘不可捉摸的东西，并且把“灵感”说成是“装配”成一部作品的“零件”。他还胡说什么“通过聊天”就可以“发展思想”，获得“灵感”，“对写作有很大的好处”，并且说文艺创作“像制造糖果一样”，就看你的手法如何，会不会做。这些极端荒谬而又庸俗透顶的论调，完全是从早已发霉发臭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它否定了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否定了文艺工作者长期认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的必要性，否定了文艺创作是一种严肃的艰苦的劳动，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取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一方面竭力把文艺创作加以神秘化，另一方面又竭力加以庸俗化，他所讲的一大篇文艺创作的“秘诀”，归结到一点，不过是文艺上的江湖骗子们的骗术罢了。他们传授这种骗术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文艺工作者引到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所走的邪路上去，改变我们无产阶级文艺的性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政治内容反动的作品，即使它带有某些艺术性，也必须加以排斥。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反过来说，政治内容正确的作品，如果缺少艺术性，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艺术所特有的感人的力量，不可能很好地起到艺术的作用。对于这一类作品，应该努力帮助它提高艺术水平。忽视艺术的倾向是错误的，但比较起来，忽视政治内容的倾向是更加错误和更加有害的。在文艺批评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以政治为统帅，在政治的统帅之下去努力提高艺术水平。只有这样，艺术水平的提高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否则就会走到资产阶级的邪路上去。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资产阶级不论如何狂热地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在实际上它仍然是为政治而艺术，仍然是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在文艺批评中如果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标准，不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艺遗产，作为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文艺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批判地吸收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有益的东西，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而不是无批判地硬搬和摹仿，更不是颂古非今。如何对待文艺遗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要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全盘否定过去的文艺遗产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又要反对以继承遗产为名，颂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艺，用它来毒害人民。只有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从反映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才可能正确解决继承遗产的问题。

在文艺的形式和风格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的发展。但我们提倡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是为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并且必须以表现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为主体。离开了这个基本的要求去讲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那就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

宗教

宗教是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支配着人们的外部力量，起初是自然界的力量。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原因无法理解，对人本身的身体构造和梦境无法说

明。自然界在人的面前表现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对于超自然的力量崇拜，形成了最初的宗教。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支配着人们的自然力量之外，又出现了同样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力量，并且是一种经常在威胁着人们的、比自然力量更加难于预见和抵抗的力量。一方面是私有制的产生和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使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愈来愈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是阶级的出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同样使人们感到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人们生活在他们自己所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但他们却不能控制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一种盲目地起作用的力量而支配着他们。这样，原先反映着神秘的自然力量的宗教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历史上，劳动人民为了摆脱剥削和压迫，曾经进行了无数次的英勇斗争，付出了极其重大的牺牲，但结果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摆脱了旧的枷锁而又带上了新的枷锁。这种情况使得在劳动人民中产生了对于来世和天国的信仰。列宁指出：“**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对于虚无缥缈的上帝和天国的幻想，是从完全现实的尘世的原因之中产生出来的。

唯心主义不能说明宗教的起源和实质，因为它本身就是宗教的李生兄弟。它和宗教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宗教采取感性的、通俗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唯心主义则采取理论的、逻辑的形式来宣扬上帝；宗教是最粗鲁、最拙劣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是精制的宗教。旧唯物主义虽然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也曾提出过某些局部的有科学意义的见解，但始终不能科学地解释宗教产生的原因。它或者把宗教的产生归结为群众的愚昧无知和僧侣的欺骗（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或者认为是出于人与人之间某种情感上的联系的需要（如费尔巴哈）。这都是离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用精神的原因去解释宗教的产生，都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宗教是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并且是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在氏族社会的早期，宗教表现为图腾崇拜（即崇拜一定的动物和植物）。氏族联合为部落之后出现了部落的神，这种神只对一定的部落有效，超出这个部落的范围之外就不灵了。在奴隶社会里，当各个部落之间的界限消失而组成为国家之后，就从各个部落的神之中分出了至高无上的神，其余的神都服从于它。人间有了等级，神也分成了等级。伴随着君主专制大国的出现，产生了单一的、全能的神。这个神，不过是尘世的专制君主在天国里的表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着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宗教也跟着发生变化，从信条到制度和仪式都逐步地变得符合于资产阶级的需要。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在阶级社会中所起的反动作用。尽管在历史上奴隶和农民有时也以宗教为旗帜来联合自己的力量，和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但这只是为奴隶和农民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外衣，只是奴隶和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斗争的局限性的表现，并不能说明宗教本身有什么进步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宗教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它使劳动人民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相信神灵和奇迹的力量，放弃现实的斗争，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和天国，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命运。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最激进的代表人物曾经公开鼓吹过无神论，但当着资产阶级一取得政权之后，它就不声不响地丢掉了无神论，从嘲笑宗教转而鼓吹宗教，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持教会，竭尽全力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阻止革命的发生。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还利用宗教作为推行殖民主义、实行文化侵略和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工具。解放前，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深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穷乡僻壤，和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相勾结，奴役和压迫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今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们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也正在明目张胆地纵容和鼓吹宗教。但是，不论帝国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如何乞灵于宗教，都绝对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无论任何时候，宗教都决然阻挡不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革，阻挡不了社会革命的到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科学是宗教的死敌。科学上的每一个发现都打击了宗教的迷信。因此，在欧洲中世纪，教会对于一切坚持真理的自然科学家，一切不愿意牺牲自己在自然科学上的发现而与宗教教条相妥协的自然科学家，总是实行残酷的迫害，直至活活烧死。现代资产阶级则除了迫害进步的科学家之外，竭力要把科学和宗教调和起来。许多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如社会主义中国的王充、范缜，十八世纪西欧的霍尔巴赫、狄德罗，和一切进步的自然科学家一样，不顾统治阶级的迫害，举起无神论的思想旗帜，同宗教迷信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所有这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的斗争，在历史上都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无神论的宣传是消灭不了宗教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宗教依然存在，因为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的根源依然存在。列宁指出：“**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掘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末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而也是彻底的无神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同时也就找到了消灭宗教的现实途径。马克思主义重视无神论的宣传，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仅靠这种宣传是消灭不了宗教的。如果认为凭着无神论的宣传就可以消灭宗教，那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消灭宗教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它产生的现实的社会阶级根源，即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人剥削

人的制度。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反宗教的斗争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不能妨碍这个斗争，更不能超越于这个斗争之上。其次，要克服群众中的宗教偏见，不能依靠强制的禁止的方法，而必须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让群众自己起来和宗教作斗争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产生宗教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摧毁，大部分劳动人民摆脱了宗教观念的束缚。但是，宗教的长期影响所造成的传统的习惯势力还没有彻底消除，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还会利用宗教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恶活动。在少数群众中，科学文化知识的缺乏，也是宗教观念的残余存在的一个原因。因此，和宗教进行斗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政治上，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宗教徒是采取团结的政策，允许他们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大力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和一切宗教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科学的高度发展，随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不断深入，人们头脑中的宗教意识必将逐步地归于灭亡。

第十一讲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围绕着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唯心论进行了长期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每一次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紧密相联，关系到革命的成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对于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做好各项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否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根本问题之一

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同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直接联系在一起。唯心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出发，或者认为个人的思想意志决定历史的发展，宣称历史是由少数非凡的“英雄”、“天才”、“伟大人物”、“批判地思维的个人”创造的，污蔑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缺乏理性”的“群氓”，是“惰性的物质”；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天命”、“上帝”、“宇宙精神”决定的，那些所谓“受天之命”、能够执行上帝意志或意识到“宇宙精神”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就是历史的当然的创造者，至于人民群众则只能绝对服从这些“上帝的选民”们的支配。

一切剥削阶级毫无例外地鼓吹这种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百般丑化和污蔑人民群众，竭力要摧毁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把剥削阶级的统治说成是绝对合理和永恒不变的。唯心史观的反动的阶级本质，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上，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如社会主义中国春秋时期的孔丘认为人生来就有“上智”与“下愚”之分，“下愚”只能接受“上智”的统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他应该统治那些“用铜和铁做成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根本不能算作人的奴隶。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如社会主义中国的董仲舒认为，帝王将相是“承天命以从事”，他们是生来就属于“上品”的“贵人”，应该统治属于“下品”的“小人”；欧洲中世纪的托马斯认为“等级划分是上帝决定的”，任何改变等级的要求都是大逆不道。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即使在它最革命的时期，也同样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如资产阶级革命最激进的思想代表卢梭就宣称人民群众是“感觉的物质”、“愚昧狭隘的动物”。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的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更是极端反动。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还曾经自命为人民群众的代表者和启蒙者，那末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则赤裸裸地表现了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刻骨仇恨，表现了他们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的无比恐惧和垂死挣扎。例如，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尼采就宣称历史是由具有“权力意志”的“超人”所创造的，胡说一个人“可以使千万年的历史生色”，恶毒污蔑人民群众是“残缺不全的、鸡毛蒜皮的人”。现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派别之人格主义扬言，“群众”这一概念是“险恶的历史骗局”，是“可怕的宣传的结果”。在它看来，群众实际上不过是“某种散沙般的乌合之众”。所有这一切反动谬论，都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效劳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如外国的普鲁东、巴枯宁、杜林、伯恩斯坦、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同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一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把自己打扮成“天才”、“英雄”、“救世主”，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推翻剥削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动力，妄图压制革命、取消革命，以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就宣扬所谓“先知先觉”的人物“指挥历史前进”，胡说什么“中华民族之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正是受他们之赐”，公开咒骂“四万万”中国人民都是“愚昧

而黑暗的”。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抛出了反动的“天才论”，一方面污蔑人民群众“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分不清鱼目与珍珠”，另一方面就大讲“天才”，狂叫“不能不承认天才”，并且无耻地自封为“超天才”，为他们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大造舆论。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关于“天才”的叫嚷越是厉害，他们顽固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面目也就暴露得越是清楚，最后终于完全露出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原形，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同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唯心史观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说：“**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的，是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进行了科学考察的结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又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因此，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能到那一个“大人物”或“上帝”的思想、意志中寻找，而只能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去寻找。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史，因而也就是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脱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民群众而存在，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撇开人民群众，而由其他任何一种力量去决定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什么“英雄”、“天才”、“救世主”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科学发现，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把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推翻了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统治作辩护的唯心史观，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物质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有生产工具，而一切生产工具，从原始的石器到近代的大机器，都是在劳动人民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对整个自然的改造的方面不断增多，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各行各业生产技能的不断提高，都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结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动，就没有用于农业灌溉的大型水利工程，没有古代的大规模的金属开采和冶炼，没有分门别类的手工业的发展。而没有这一切，也就没有古代奴隶社会的经济繁荣，没有奴隶主所独占的一切物质财富，没有后来的全部人类文化。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建立在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一切剥削阶级，都靠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胡说什么“剥削有理”、“剥削有功”，只不过充分暴露了他们充当剥削阶级走狗的无耻咀脸。

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这首先是因为一切精神文化的创造活动，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前提，而这种前提，正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就没有一切精神文化的产生。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千百年来被剥削阶级的哲学家完全掩盖和抹煞了。他们把劳动人民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说成是“低贱的”事情，把剥削阶级所从事的精神文化活动说成是只能由少数“天才”人物进行的“高尚的”事情。如实用主义的头子杜威就说什么群众始终“同低贱的、物质的东西打交道。而杰出人物、精神的贵族则运用了高尚的理想。”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也污蔑群众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这些剥削阶级的辩护士自以为他们是无比“高尚”的了，然而没有劳动人民所生产的米、油、盐等等这些所谓“低贱的、物质的东西”，他们究竟能够“高尚”得了几天呢？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士大夫及其遗老遗少们所标榜的“风雅”时说得好：“‘雅’要地位，也要钱”。他指出中国著名的所谓“田园诗人”陶渊明，如果没有奴仆为他从事生产劳动，那就“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那里还能吟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呢？鲁迅的批判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戳穿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其次，大类历史上一切精神文化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呢？它只能从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三大革命实践中来。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至于文艺，它本来就是起源于劳动，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直接的、形象的反映。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虽然部分地也反映生产斗争，但始终同阶级斗争不可分离。科学上各种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文艺上各种有价值的作品的产生，都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有其深厚的基础，决不是那一个“天才”的纯粹偶然的发现或一时的“灵感”的产物。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在古代就发明电子计算机或提出控制论的思想，因为当时的生产实践还不具备产生电子计算机或控制论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因为只有在这时，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发展才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英国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的作品，决不像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胡说的，是

莎士比亚的某种神秘的狂想的产物，而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社会关系的深刻反映。这种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整个社会生活的风貌，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反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没有这种斗争，就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最后，人民群众不仅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前提，开辟了无限丰富的源泉，而且还直接参加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尽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创造精神财富的各种条件，但人民的创造智慧仍然在曲折地生长着，剥削阶级的一切残酷迫害都掩盖不了它所放射出的光辉。在科学方面，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创造都来自劳动人民。中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升，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发明火车的史蒂芬逊，美国发现电的作用的弗兰克林，发明电灯、电影、留声机的爱迪生，俄国大科学家罗蒙诺索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魏特林，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都出身于劳动人民，或本人同时就是劳动者。在文艺方面，人民群众的创造智慧的表现更为明显。以文学创作来说，如鲁迅所深刻指出的，“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如神话、寓言、诗歌、故事等，源远流长，始终不绝，其中被记录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少的部分。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如古代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是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写成的。许多大作家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们从民间文学中所吸取的养料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代中国的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都是例证。在造型艺术方面，如社会主义中国敦煌的壁画，流传于民间的年画，民间的泥塑和石雕，丰富多彩的工艺美术和宏伟壮丽的各种建筑，都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

人民群众之所以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上表现了杰出的智慧和勇敢的创造精神，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最少剥削阶级的偏见。科学史上和文艺史上的大量事实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个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出于他们仇视人民群众的反动阶级本性，一方面污蔑人民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却公然把奴隶主的思想代表孔丘推为中国文化的创造者，说什么孔丘“删诗书、作春秋，……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现在，便有文化。”他们的这种反动论调，又一次揭穿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清楚地暴露了他们是拜倒在剥削阶级面前的无耻奴才，是历史唯心论的狂热鼓吹者。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社会的变革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变革的转变，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但是，旧生产关系的灭亡，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人们自觉活动的结果，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旧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反动的剥削阶级，从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剥削阶级必然要利用旧上层建筑的力量，首先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阻碍和反对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可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历史前进。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谁是推翻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主力军和决定性的力量呢？是人民群众。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奴隶起义是实现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农民和城市平民的起义是实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是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在它处于上升时期的情况下，曾经充当过革命的领导者，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任何时候，革命的主体和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恩格斯在谈到德、英、法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无论如何，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平序，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施二世送上断头台。**”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否定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把人类历史说成是由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所发动的连续不断的政变史。这是对于历史的极大歪曲，是十足的、赤裸裸的历史唯心论，是妄图篡权复辟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反革命梦想。人类历史，是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历史。只有人民群众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使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推动历史前进。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是通过少数人发动的政变而得到实现的。中国历史上每个旧的封建王朝的灭亡和新的封建王朝的产生，都是直接间接地利用了农民起义的结果，而不是宫廷政变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同封建贵族进行了殊死战斗的结果，而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在1688年所实行的宫廷政变的结果。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经企图通过宫廷政变而实行“变法”，但很快就遭到了惨败。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反动的剥削阶级通过政变方式夺走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他们所发动的政变能否实现，在根本上也仍然决定于人民群众和反动阶级的力量对比。在人民群众的力量相对弱小的某种情况下，反动阶级所发动的政变可能暂时得逞，个别卑鄙无耻的野心家、阴谋家可能成为显赫一时的“大人物”，历史可能暂时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决不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发动的政变所能改变的。一切反动阶级的反革命政变都是短命的，都只能加速他们自己的灭亡。中国人民是在革命导师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斗考验、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里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妄图用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方式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完全是白日做梦。历史已经对这一小撮妄图用螳臂挡车的小丑作出了无情的判决。

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不同的

恩格斯说过：“人们自己创造着不同历史时期人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作用是不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无论任何时候，人民群众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挥程度是不同的。

在近代无产阶级出现以前，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每一次斗争，其成果最后都落到了剥削阶级的手中，以建立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告结束。按劳动人民所处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来说，他们的彻底的革命要求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新的剥削制度，而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可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革命政党的领导，这种要求总是不能实现。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奴隶和农民的斗争还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是过去一切劳动人民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丝毫也无损于历代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

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使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大机器工业的产生，把生产力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使得任何剥削制度的继续存在都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说历史上一种剥削制度在它产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经起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而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那末，现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存在都是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的了，它必然要被打破、被消灭。而执行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就是进行大机器生产的无产阶级。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找到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道路，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组成最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大军，创立领导斗争的革命政党，把历代劳动人民要求消灭剥削制度的理想付诸实现，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压迫，生活在黑暗的统治之下，他们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摧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摆脱了剥削和压迫，掌握了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他们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教育下，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在为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这就使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挥。当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全人类都进入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代，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将得到更加全面、更加充分的发挥。

中国人民在革命导师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广大劳动人民参加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和管理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医药卫生等各方面，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千百年来一直为剥削阶级所垄断的文化教育回到了人民手中。来自三大革命实践的工农兵学员正在茁壮成长，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正在形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广大工人、农民在哲学、文艺、科学上的创造越来越多。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解放后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个事实本身，有力地驳斥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决不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所能够抹煞得了的。他们所发出的种种无耻澜言，只不过是他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的表现。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各国人民创造历史、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伟大作用，表现得愈来愈强大有力。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当代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论苏修、美帝如何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镇压人民革命，都不可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各国人民必将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两个所谓“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反革命幻想必将进一步遭到彻底破产，未来的世界必将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世界。

二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充分承认和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其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最主要的是表现在政治上、阶级斗争上。人民群众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上每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结果。但是，人民群众为了进行斗争，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就需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需要有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列宁指出：“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推举出了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任何一个阶级，如果没有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我们知道，

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些领袖，在不同程度上集中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了革命的口号和纲领，制定了革命的步骤和计划，把广大群众的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反动统治阶级的洪流，使反动阶级的统治陷于瓦解和崩溃。没有革命的领袖，广大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分散的行动就不可能形成集中统一的行动，革命的力量就不能发展壮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就不能打倒。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因而是一场空前尖锐、剧烈和复杂的斗争。无产阶级要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有坚强的严密的组织，有由本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有率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去进行战斗的革命领袖。列宁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后列宁在这里科学地阐明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批判了那种把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了无产阶级领袖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斗争中产生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组成具有严格纪律、步伐一致的革命大军，不可能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辨明前进的方向，引导群众去打倒阶级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于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必定要胜利的保证。

无产阶级的领袖不同于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的领袖。领袖是阶级的代表，阶级的面貌决定着领袖的面貌。无产阶级领袖所代表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是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性的阶级，是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领袖是过去一切革命阶级所不可能产生的最伟大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领袖才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完全科学的革命理论，给劳动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领袖，才能始终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人类历史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其他任何革命阶级的领袖所不能比拟的。历史上农民阶级的革命领袖，一如社会主义中国的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李自成、洪秀全曾经对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起了号召、鼓舞、组织、领导的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将永远载入人民的史册。但是，由于农民阶级所处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和各种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不可能创立革命的政党，不可能在革命队伍中和领导集团中始终保持严格的革命纪律，抵制剥削阶级的腐蚀和影响。这就给了地主阶级以可乘之机，最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在它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时期，也曾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领袖，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在阶级地位和广大劳动群众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当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劳动群众还能有部分的、暂时的一致，其对立的方面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发展的时候，他们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行动客观上符合于劳动群众的要求，基本上起着进步的作用。但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同劳动群众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资产阶级的领袖也就日益反动，成为劳动群众革命要求的镇压者，失去了任何进步的作用。除了历史条件的局限之外，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的领袖都有着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才能免除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列，领导人民群众不断推动历史的前进。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自己的革命导师。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诞生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科学发展的积极成果，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国际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把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列宁的杰出的学生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他在列宁逝世之后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功勋。

社会主义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是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最杰出的代表。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献。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主席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它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对世界革命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那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无产阶级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引起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恐惧和仇恨，对无产阶级领袖进行恶毒的攻击。混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妄图中伤、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作用，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罪恶目的。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就是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叛徒们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领袖的手段之一。无产阶级领袖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建立在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它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领袖的由衷的热爱和崇敬。这种威信，就是党的威信、阶级的威信，是人民群众的最宝贵的财富。它具有极大的动员力量和号召力量，是革命的旗帜、胜利的旗帜。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是出于对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的爱护，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的深刻表现，和剥削阶级历来鼓吹的个人崇拜毫无共同之点。一切机会主义者所谓的“反对个人迷信”，其实质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无耻污蔑和攻击，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

除了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常常采取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手法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在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幌子下，竭力把无产阶级的领袖神秘化和偶像化。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架空无产阶级领袖，破坏领袖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歪曲和丑化领袖的伟大革命形象，从根本上破坏领袖的威信；另一方面是为了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领袖的最忠实的信仰者和崇拜者，借领袖之名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达到他们最后推翻无产阶级领袖，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托洛茨基匪帮在反对列宁的时候曾经采用过这种手法。他们一方面在暗地里污蔑咒骂列宁是“最大的暴君”，另一方面却又装成列宁的最忠实的拥护者，说什么列宁是“天才中的天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斯大林揭穿了他们可耻的阴谋诡计，使他们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今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大讲特讲无产阶级领袖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和当年托洛茨基匪帮的反革命伎俩完全是一路货色。革命导师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及时地指出“天才论”是反动的唯心史观，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反革命的理论纲领，撕破了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粉碎了他们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阴谋。

马克思主义历来坚决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把个别人物神化。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杰出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的作用，这和历史唯心主义者所宣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

彻底批判唯心史观在个人作用问题上的反动谬论

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讲“历史的必然性”，不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而是什么“神秘主义”、“形而上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歪曲和污蔑。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在于如何说明、解释和估计这种作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散布了种种反动的谬论。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历史上一切发生了影响的人物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人物。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这些人物是超阶级的，是什么抽象的“理性”、“良心”、“宇宙精神”的代表。这纯粹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要掩盖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动阶级属性，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以利于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杰出人物，不同阶级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反动统治阶级决不会承认代表人民利益的人物是他们所谓的杰出人物，是他们心爱的“理性”、“良心”等等的代表。一切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物，历来都被反动统治阶级视为大逆不道，而加以种种迫害。反过来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决不会承认那些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奴役人民、镇压人民，拖着历史倒退的人物是什么杰出人物，而是如实地把他们看成是必须打倒，也一定能够打倒的反动物。我们所说的杰出人物，指的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对历史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人物，其中首先是指历代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其他代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物。至于对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则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一般说来，每一个剥削阶级在它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它的利益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基本上还是一致的，要求推翻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社会势力，因此这个时期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曾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给这些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但必须看到他们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其他代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利益的人物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对于这些人物，既要看到他们有和腐朽的社会势力进行斗争的一面，又要看到妥协的一面；既要看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他们所代表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客观上和人民群众有暂时和部分的一致的一面，又要看到根本对立的一面。不加分析地颂扬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无原则地美化他们，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上发生了影响的人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卷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历史人物的产生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現象，或者是由“天意”、“上帝”，“宇宙精神”所决定的。

历史的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的阶级来说，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斗争提出了某种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而且解决这一任务的历史条件至少已初步具备的时候，才会产生促使这一任务得到解决的杰出人物。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只可能产生在秦朝末年，而不可能产生在秦朝初年。因为只有在这时，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才达到了完全激化的程度，农民起义一触即发，迫切需要有组织领导起义的人物。而陈胜、吴广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登上了历史舞台，掀起了一场席卷秦王朝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社会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孙中山成为一个目标明确、行动坚决和发生了重大影响的革命领袖，只能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而不可能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因为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广大人民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加深，加上世界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涨，这才使得中国有可能进行比过去更为坚决、明确和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出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且只能产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即十九世纪的中期以后。因为只有在这个时期才具备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必需的条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充分暴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十八世纪以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等等），才可能产生出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无产阶级指出彻底解放的现实道路。所有的历史事实毫无例外地证明了代表革命阶级的杰出人物的产生，是由人民群众的斗争所决定的，既不是纯粹偶然的现象，也不带有任何神秘的性质。至于那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的人物，即统治阶级所谓的“杰出人物”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纯粹偶然产生的，而是适应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产生的。例如，中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方面产生了代表广大农民革命要求的许多杰出的领袖，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地主阶级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些血腥的刽子手（如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汉奸卖国贼曾国藩等）一切历史人物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在于这种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不过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期，——或好或坏，但愚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键了被战争弄簿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

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把代表他们进行统治的人物，说成是由于某种神秘的天意而产生的，以愚弄和欺骗人民群众，要人民群众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俯首贴耳地接受反动阶级的统治。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的“天才论”，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反动谬论。他们不顾起码的历史常识，胡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把无产阶级领袖的产生说成是一种极其神秘而稀奇的现象，其目的就是要把他们自己打扮成古今少见，不可思议的“天才”，要人民群众盲目崇拜他们，听凭他们去复辟资本主义，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伙骗子打的是歌颂无产阶级领袖的招牌，实际上却是在放肆地污蔑无产阶级领袖，为他们篡权复辟制造舆论，做今日“真龙天子”的反动迷梦。他们的谬论，是历史唯心论者用来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以神秘化的一种惯技，是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类反动论调的翻版。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不需要任何神秘化，不需要用神秘化的方法去欺骗和统治人民，只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才需要这种卑鄙伎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什么时候产生，不是由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捏造的胡言乱语所决定的，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也决不是因为他是多少年内产生的，而是因为他代表了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领袖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人民革命领袖中最伟大的领袖，但无产阶级领袖从来不割断历史，从来不否认过去一切人民革命领袖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只有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才需要割断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的“超天才”。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由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的阶级关系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决定的。代表革命阶级的人物，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代表反动阶级的人物，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由这些人物的思想、意志决定的，是由这些人物先天具有的“才能”，“智慧”、“批判的思维能力”、“非凡的意志”等等决定的。

历史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是由于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不是由于他们具有什么先天产生的特殊的智慧或才能。当然，杰出人物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他个人的精神品质、智慧、才能、意志等等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任何杰出人物，不论他有多大的才能，只要他脱离了人民群众，就必将一事无成。如果他反对人民群众，就只能自取灭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人物，当他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是有力量的，对历史的发展起了进步作用；而当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进而反时人民群众的时候，就从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摔了下来，为历史所淘汰。其次，任何杰出人物的智慧、才能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一切革命的智慧、才能的不竭源泉。杰出人物具有多大的智慧、才能，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

的要求，他对历史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决定于他的阶级立场，决定于他和人民群众联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于他所参加的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之所以具有任何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不可能具有的最高的智慧和才能，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最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因而能够正确地、全面地、及时地反映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洞察历史前进的方向，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把革命不断引向胜利。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靠一个阶级、一个党，靠群众路线。

一切反动阶级违背客观的历史事实，宣扬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决定于先天具有的“智慧”，“才能”等等，这完全是为了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说成是天生的“全知全能”的人物，因而是当然的统治者。实际上，一切反动阶级所谓的“英雄”，都是平庸可笑的人物，都是最愚蠢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的一切自以为“聪明”的举动，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反动的“天才论”，把他们自己扶上“天才”的宝座，自以为从此就可以篡党篡政，为所欲为了，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唯心论的幻梦很快就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历史又一次证明了以“天才”自命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实质上是最大的蠢才。不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镇压、破坏、摧残人民革命的手段是如何的狡猾、恶毒和阴险，（这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智慧”和“才能”）他们都绝不可能超越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而行动。如果说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有时会以“英雄”的面目出现，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天生的“非凡”的“智慧”和“才能”，可以任意地左右历史的发展，而是因为在一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之下，由于人民力量的相对弱小，使得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能够暂时得逞。但是，历史前进中所发生的这种曲折决不能挽救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而只能把革命的人民锻炼得更加强大，使革命进行得更加广泛、深入和彻底。

第四、唯物史观认为杰出人物的活动能够对历史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向。

唯心史观则完全相反，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方向是由某些所谓的“天才”、“英雄”、“救世主”所决定的。

历史的事实驳斥了唯心史观的这种反动谬论。从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杰出的革命领袖对于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正确领导，能够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但不可能超越当前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例如，不可能在民主革命的阶段去完成只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能完成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有一些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宣扬革命是可以依靠少数领袖人物“制造”出来的。这是一种荒谬而反动的理论。杰出的革命领袖的伟大，决不是因为他能够人为地去“制造革命”，而是因为他能看出现实生活中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去正确地领导革命，推动革命的前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已经具备了，但由于领导者不善于利用这种可能性，结果还是遭到了失败。这种情况能够推迟革命的胜利，延缓历史的发展，但不可能改变历史前进的势趋。个别领袖人物的某些偶然的情况，也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某种影响。例如社会主义中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最有威信的领袖张角的早逝，无疑给农民起义带来了不利的影晌，但它并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农民起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至于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革命人民的猖狂进攻，可以使革命的发展遭到某些挫折和失败，历史可能暂时倒退，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不论经过多少艰难曲折，革命势力一定要战胜反动势力，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梁启超说什么只要“大人物”的“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说什么只要他们这些“天才”“一阵风吹下去”一切事情都可以改变面貌，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梦吃，是反动阶级用来愚弄和吓唬人民群众的骗术。1927年，蒋介石刮起了一阵不算小的反革命妖风，但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全部改观，蒋介石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必然灭亡的命运。从那时到现在，历史过去了四十多年，中国人民已经空前强大，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却还想祭起一阵反革命的妖风来把中国人民吹倒，这不是她蚍蜉撼大树又是什么呢？反动阶级的“天才”，“英雄”们在灭亡之前，经常扮演这种蚍蜉撼大树的丑剧。这是为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他们永远不可逃脱的历史命运。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两种历史观的解释和说明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的本质就在于承认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心主义在一切方面竭力夸大个人的作用而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则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两者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需要有自己的杰出人物，而且必然会从斗争中产生出这样的人物。这些人物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能够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站在历史的前列引导群众，帮助群众尽可能迅速地推动历史的前进。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排斥和否定杰出人物的作用，而恰恰是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杰出人物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史观否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说明个别人物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唯心史观把个别人物的产生说成是不受任何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把个人的作用夸大能够任意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动幻想。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在他们的反动的“天才论”遭到全国人民的无情揭露和有力批判之后，又抛出了一个所谓“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妄图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的诡辩手法来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掩盖他们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面目，挽救“天才论”的破产。这完全是枉费心机。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

创造历史，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就必然要否定英雄创造历史，反过来也是这样。任何想用折衷主义和二元论把两种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都只能是一种骗局。我们只要看看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是怎样把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吹捧为“先知先觉”，把他们自己封为“天才”、“超天才”，又怎样把人民群众污蔑为“愚昧而黑暗”、“见不到文化，见不到光明”、只知道“怎样搞钱”的“群氓”，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谓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是怎样的虚伪和反动了。如此蔑视人民群众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这一小撮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走狗，难道真会承认人民群众和他们这些“天才”、“英雄”一样地具有创造历史的作用吗？当然不会的。他们所谓的“共同创造历史”，就是妄图要人民群众充当他们这些“天才”的阿斗和仆从，任凭他们去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拖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其次，从理论上讲，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的谬论，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而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奴隶们即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却否定这一观点，说什么历史是由“英雄和奴隶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的创造只有群众不行，还要有他们这些“英雄”。这不是用二元论伪装起来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又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说历史的创造离不开他们这些“英雄”，可是全部历史事实却证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他们这些“英雄”创造的。至于说到人民群众自己的英雄人物，那末，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们是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不是在人民群众之外或之上的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英雄人物在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但英雄人物的出现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所决定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进历史。”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把英雄和群众割裂开来，把英雄说成是与群众不同的另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和篡改，其目的是为了否定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贩卖反动的唯心史观。

三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和党的群众路线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人民群众的解放只能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进行斗争，而不能靠那个“英雄豪杰”、“救世主”的恩赐。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诗人欧仁·鲍狄埃在《国际歌》中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最显著、最充分的表现。历史上推翻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起来斗争的结果，都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在每一次革命中，群众是否已经发动起来、群众发动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决定着革命发展的规模和它能够进行到怎样的程度。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前进，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得到实现。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不能推翻，新的社会制度就不能建立，建立了也不可能巩固。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毛主席指出，对待群众运动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第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第二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这第二种态度，实质上和第三种态度，即反革命的态度是站在同一个观点上的，充当了反革命的帮凶和走狗。

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工具，而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斗争时，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曾不得不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翻封建制度；但当群众的革命运动超出他们所许可的范围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限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机会主义者即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本来不过是口头上的动听词句。真正到革命的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惊惶失措，对群众运动采取讥笑、咒骂、打击的态度，由害怕革命进而反对革命、背叛革命。历史上的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每一次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无情地撕去了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外衣，露出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的原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是这样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当着农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千百万被压迫的奴隶们起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者时，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却高叫什么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竭力压制和破坏农民运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革命武装，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分子彭德怀疯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恶毒攻击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运动，妄图使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及其一类骗子采取了各种手法来破坏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或者利用自己所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或者鼓吹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否认党的领导，妄图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以达到他们破坏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切机会主义者破坏和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是为他们反动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坚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自己视为“英雄”，把群众看作“群氓”，从来不相信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智慧和力量，不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因此，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始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对于那些在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却津津乐道，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以此来嘲笑、污蔑、否定群众运动；或者反过来颂扬和美化这些缺点和错误，妄图愚弄和欺骗群众，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变成实现他们反革命目的的工具。

同一切机会主义者相反，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在首要的位置，坚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赢得彻底的解放。他们总是热情地支持群众运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仔细倾听群众的呼声，深入研究群众斗争的经验，积极扶植和发展群众运动中的新生事物，集中群众的智慧和要求，提出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引导群众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革命导师毛主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信只要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团结起来，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打倒。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诬蔑、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观点和他们所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把千百万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支持群众运动，但同时又指出群众运动必须有党的领导，必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首先，群众运动要持久地发展下去，有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必须有一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路线。而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不可能从群众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就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迷失前进的正确方向，在战略和策略上发生种种错误，以致为反动阶级镇压下去或被反动阶级所利用。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一切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的看法，都是极端错误和反动的。

其次，在每一个大的群众运动中，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包含着先进、中间、落后三部分人。要使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变为指导群众行动的方针。对于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则应该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之改正，而不能采取迎合和迁就的态度，更不能把它当作指导群众运动的方针。毛主席指出，在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原则应当是：“凡属人民大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方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同时又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教育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克服错误倾向，领导群众前进。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具体的教育和领导的作用，群众运动要健康地向前发展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群众运动和党的领导，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我们既要反对脱离群众、否定群众运动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脱离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反对一切形式的“自发论”。“自发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想，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实际上是在愚弄和欺骗群众，为资产阶级效劳。“自发论”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其实质就是取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指导，听凭资产阶级去支配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引到失败的道路上去。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指出：“**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鼓吹任何群众运动都是“天然合理的”谬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早已痛斥过的“自发论”的翻版。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坚决支持群众运动的样子，实际上是在阴谋破坏群众运动，妄图把群众运动引入他们的反革命轨道。对于来自群众的、符合于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和做法，他们采取排斥、压制和打击的态度；相反，对于那些违背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意见和做法，他们却在支持群众运动的幌子之下，采取纵容、保护和助长的态度，到处火上加油，推涛作浪，惟恐天下不乱。在这一伙骗子的心目中，是从来没有群众的利益的。他们和历史上的一切野心家和阴谋家一样，极端蔑视群众，把群众看作无知的“阿斗”和“群氓”，看作他们可以任意加以利用的工具。他们高唱的“天然合理”就是要让群众运动去合资产阶级的“理”；他们所热衷的“自发”，就是要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群众路线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基本方法。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科一学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理之上的。

毛主席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深刻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主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利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而这两个方法

都贯串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毛主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符合群众需要的领导意见、计划、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群众是三大革命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最了解实际斗争中种种细致、具体、复杂的情况，最富于实际经验，最有智慧和才能。一切符合群众需要的领导意见、计划、办法，只能从群众中来。要形成这样的意见、计划、办法，就必须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轻视群众，昂首望天，自命为“先知先觉”，这是历史唯心论者们的幻想。我们必须打破和粉碎这种幻想，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正确的领导。

“到群众中去”，就是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计划、办法，必须再使之变为群众的行动，通过群众的斗争实践加以检验、发展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不仅是一切领导意见、计划、办法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这些意见、计划、办法是否正确的唯一尺度。其次，任何意见、计划、办法，即使它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没有变为群众的行动，那就仍然不过是纸上的空谈，不可能在实际上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这里重要的是要善于使领导的意见、计划、办法为群众所接受，见之于行动。这就需要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用正确的思想去武装群众，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那种认为领导的意见、计划、办法只需要少数人知道，不需要广大群众知道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历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总是宣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群众看成不过是盲目执行统治者意志的工具。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论，在一切工作中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害了慢性病。既要使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又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这是群众路线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离开这个原则，必然要犯错误。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是一致的。列宁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联为一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不论在任何时期，革命的主体、革命的根本力量只能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确定那些阶级和阶层是中国共产党所依靠的基本力量，那些阶级和阶层是必须加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中最革命最积极的阶级和阶层，同时又要团结一切中间的阶级和阶层，争取落后的阶级和阶层。看不到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离开党的阶级路线去讲群众路线，必然要把群众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是不可分离的。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要长期地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不断从斗争中提高自己对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认识，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决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为某些暂时的、个别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还要正确解决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必须时刻不忘这个出发点，加紧世界观的改造，纠正一切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倾向。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修整风运动中，必须注意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失去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就不可能领导群众共同奋斗，不可能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树立群众观点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前提，但除此之外，还必须掌握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

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半个世纪以来，在革命导师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中，一贯地坚持群众路线。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光辉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极大地鼓舞了社会主义中国亿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当前，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更说明了革命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无论是建立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需要团结大多数群众，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今天的革命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坚持革命的群众路线，团结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时破除宗派主义，加强各革命组织的联合。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为在中国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而奋斗！

